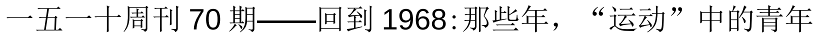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不再年轻的保罗 麦卡特尼唱响 Hey Jude，引来万人合唱。这首歌最初传唱于 1968 年，那一年，与麦卡特尼等人组成披头士乐队的约翰 列侬创作了歌曲 Revolution，“五月风暴”席卷法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占领了校园；在这些西方年轻人所向往的红色中国，红卫兵的疯狂被终结，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那一年，中



西年轻人的社会运动隔空交汇，并互相审视：法国报刊惊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参考消息》上的新闻标题则是：西欧学生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1968 年的社会运动中，中西年轻人各自经历了什么？今天的他们如何看待过往、审视对方？本期 1510 周刊，我们回顾和审视 1968，端详社会运动中的年轻人。

1968 年，滚石乐队和披头士用音乐与时代互动，前者受“五月风暴”启发，创作歌曲《街头斗士》，列侬则从这一年开始转变，尝试透过摇滚乐来凝聚青年文化的政治力量。如张铁志所言：“文化的力量往往会超过当初创作者的原意。”两支乐队所激起的声响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剧烈，结果是，《街头斗士》被 BBC 禁播，列侬被尼克松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

同音乐一样，文字和言语让人解放。苗炜和刘宇的《1968：不安分的年轻人》呈现了文字和言语在那个时代的力量，在他们看来，不惹非议地评价 60 年代的遗产很难，而“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却一定名列其中。喜爱列侬、金斯堡和马尔库塞是那一代西方年轻人的特征，这与他们的成长背景与社会环境相关，lily 的《1968 年街垒之战》以此开端，呈现了这场社会运动的全景。

在西方年轻人激昂地冲向街头或是占领校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开始上山下乡，这是不由他们决定的社会运动。知青谭全民的《1968，无知的我们走向未知》呈现了他的回忆。更晚出生的谢盛友在《我的 1968》中以孩童的视角回忆那一年“运动”影响下的生活。朱学勤则将目光置于一代人身上，他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提出“六八年人”的概念——他眼中的这代人较早怀疑“运动”的意义，并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后来却在思想史上消失。

1968 年在中西几乎同时进行着的社会运动有何关联？孙冉的《记忆 1968 年：中国青年的“反革命”噩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亲历“五月风暴”的法国人在中国办画展，另一位知青与他在此相遇。徐友渔以学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探讨西方学生和中国学生的 1968，他认为中西方学生社会运动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不同，西方学生的造反带有强烈的自发性，而中国学生的自发性不强，行为动机是响应号召，听毛主席的话。学者周穗明的观点是：中国文化革命和西方 1968 革命两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严格地说，西方 1968 年运动具备文化反叛的客观条件，是一场必然发生的革命；而中国的文化革命则不具备客观前提，是一场偶然的、人为建构的伪革命。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論壇
我在中國
Co-China

【西】

9-1 张铁志：一九六八、滚石乐队与约翰·列侬



“左翼知识分子阿里邀请贾格尔把《街头斗士》的歌词用手写的形式登在他刚创刊的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 上。在同期杂志上还有另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来配合这首歌词，那是一个世纪前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文章：《论街头抗争》。”

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是六○年代英国，甚至全球，最伟大的乐队。

在那个狂乱而改变世界的一九六八年，他们是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声呢？

前一年的一九六七年，表面上是爱与和平的嬉皮年代。披头士唱著《你需要的只有爱》这首歌，呼喊着用爱来取代暴戾与对抗；并且以《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tg.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来体现那个时代的斑斓。但始终是坏男孩形象的滚石乐队，却用专辑《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揭示了那个时代斑斓色彩下的黑暗。

到了一九六八年，他们的对比更加强烈。

1

在六〇年代后期，许多左翼人士已经开始看到摇滚可以成为青年文化革命的弹药。因为摇滚的节奏可以让人震动，可以挑动青年对身体的欲望、破坏保守的社会秩序。这些反叛与

破坏的能量如果被导引到政治上，将不低于传单或子弹，而离经叛道的滚石就是摇滚乐的黑暗使者。

一九六八年，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想结合影像与摇滚乐的激进潜力，于是拍摄一部电影，内容是滚石乐队录制《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首歌的录音过程，并剪入许多街头抗争的画面。[1]

当政者也没有低估摇滚的力量。米克 贾格尔（Mick Jagger）当时的女友玛丽安娜 菲茨芙（Marianne Faithfull）就说，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英国政府已经把滚石视为国家的敌人，计划要把滚石搞垮。而这一年，警方突袭滚石吉他手理查德（Keith Richard）的家，并在六月以持有安非他命为罪名审判他和贾格尔。

面对这场审判，贾格尔说：“有人不喜欢我们在歌曲中表达的理念，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阻止我们，斩断我们的影响力。”英国《泰晤士报》社论就说：“滚石乐队显然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名声，而非他们真正的罪，而被判刑。”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号，在英国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一场反对美国越战的上万人示威运动正在盛大举行。游行的带头者是从当时至今都是英国最闪亮优雅的女演员瓦妮莎 雷德格瑞夫（Vanessa Redgrave），和从当时至今都很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阿里（Tariq Ali）。示威行动成为一场警察和抗议民众间的严重冲突，民众用石块攻击警方，警察则在烟雾弹中痛殴民众。

在这场暴动中，有一个最闪亮的明星也在抗议的队伍中，他是米克 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贾格尔说：“你感觉到你是和一群想要改变世界人的在一起，而且你真的被群众带着走，不论他们要走到哪里。这就好像在舞台上，观众给你如此大的能量，你真的不知道如何驾驭它。”

五月，在海峡的另一头，巴黎的百万学生和工人正在街头掀起另一场革命。这两个事件刺激米克 贾格尔写下滚石最著名的政治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后来在接受滚石杂志创办人扬 温纳（Jann Wenner） 的访问时， 贾格尔提到巴黎五月革命对《街头斗士》的直接启发：

“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奇异的时代。美国也是，因为越战和其他各种骚动。在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各种暴力在燃烧着。他们几乎要推翻了法国政府……但是相对的，伦敦却非常安静……”

在《街头斗士》中，贾格尔唱着：

在每个角落，我都听见了游行的沸腾声音

因为夏天已经来了，而这是在街头战斗的时刻

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因为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伦敦城，是容不下一个街头斗士的啊

……

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

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侍

这样的歌词震惊了所有人。从来没有一个大牌如滚石的音乐人如此推崇暴力与革命。与此相比，十年后朋克乐队“性手枪”的《无政府主义在英国》（Anarchy in the UK）似乎也温和了起来。

当这首歌在六八年八月底发行时，美国，以及欧洲从巴黎、罗马到柏林等城市都正在激烈的燃烧着。BBC 决定禁播这首歌。左翼知识分子阿里邀请贾格尔把歌词用手写的形式登在他刚创刊的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 上。在同期杂志上，还有另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来配合这首歌词，那是一个世纪前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文章：《论街头抗争》。于是，这本小杂志的当期封面上写着：本期内容——米克 贾格尔和恩格斯谈街头抗争。

这是滚石作为一股反文化力量和左翼运动结合最紧密的一刻。

2

文化的力量往往会超过当初创作者的原意。

当《街头斗士》这首歌被抛掷在一个暴力的时代中，其所激起的声响，比滚石乐队所想象的更剧烈。尤其是当年八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民主党大会，许多组织都计划前往抗议，因

此芝加哥电台禁播这首煽动性歌曲，唱片公司在后来也被迫把单曲封面——群青年抗议的照片——换掉，以免让人以为他们赞成芝加哥的暴动。

虽然当政者害怕街头斗士的力量，但滚石可没有预期自己的歌真的能掀起什么革命。正如理查德所说：“美国许多电台禁播这首歌只是证明他们多么偏执疯狂。”贾格尔也说：“他们说这首歌是颠覆性的。那是当然。但是如果认为一首歌就可以让人发动一场革命，可是愚笨的想法。”

细究歌曲本身，滚石虽然表达对革命的憧憬，但并没有说他们要参与街头战斗。他们要做的，其实只是去组建一个乐队。正如歌词所说：“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理查德说：“我不认为人们了解我们想要做什么，或是贾格尔在歌曲中谈什么。我们不是说要上街头，而是说我们只是一个摇滚乐队。政治是我们想要远离的。”而贾格尔说得更清楚：“这首歌曲本身就是我唯一和街头抗争产生联系的行动。”

如果在歌词中，滚石对自身是否参与街头抗争透露出暧昧的态度，那么这首歌为何还能如此撼动体制呢？那是因为歌曲的政治力量不是只来自歌词；从前奏开始，《街头斗士》的声响与节奏就让人想要激动地舞动身躯，起而战斗。《街头斗士》的音乐就是响亮的街头号角。

3

同样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披头士发行列侬写下的歌曲《革命》，来质疑学生革命。

相对于列侬对革命的保留，彼时的英国新左派认为，滚石才是属于革命的乐队，《街头斗士》证明他们是一支政治激进的乐队；披头士的《革命》则是攻击他们正在争取的一切 。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 在六八年十月这一期，除了刊载米克 贾格尔手写的《街头斗士》歌词，也发表一篇《给约翰 列侬的信》，严厉批评《革命》这首歌：

“或许现在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抗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压迫的、邪恶的、威权的体制……你知道，从你自己的经验，这个体制只让劳工阶级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多么微小的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仁慈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这是不可能的。在你所期待的

那种充满爱的社会出现前，这个体制必须被改变……而要改变世界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然后摧毁他，无情地……没有客气的革命这种事。”

最后这封信说:“看看我们的社会，然后你扪心自问，为何会如此？然后你应该加入我们。”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列侬竟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响应。

“你们自以为是什么东西？你们自以为懂什么？我不只反对体制，我也反对你们。我知道我反对什么：狭隘的心、贫富差距。

……我告诉你这世界有什么问题，是人本身！你要摧毁人类吗？无情地？除非改变你们的我们的头脑，否则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你来告诉我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谁搞砸了共产主义的？就是病态的头脑！……你好像认为这只是一场阶级战争。

……与其去比较披头士和滚石，不如大气一点，想想我们所处的世界，然后问问你自己，为什么？然后加入我们吧。”

——约翰 列侬

PS. 你们摧毁世界，而我会重建它们。”

这场辩争是典型的新左派与嬉皮的辩论。后者强调心灵改革，前者强调透过政治与社会革命来改变体制。但当然，这两者未必真的互斥。

然而没有人想到的是，就在一年之后，真正转变为新左派的是当时被批评为保守的列侬，而不是米克·贾格尔。

一九六八年底，滚石褪下战斗姿态，穿扮起小丑服装，为电视拍摄“摇滚马戏团”的现场演唱。戈达尔为他们拍摄的政治意味浓厚的电影《一加一》被迫在最后放入《同情魔鬼》的完整版，因为制作人认为这才会吸引观众，但戈达尔不愿意，并且批评滚石是不愿意捍卫他的版本的懦夫。

毕竟滚石想做的只是一个成功的摇滚乐队。对政治革命的浪漫憧憬只是五月巴黎街头的烟硝迷雾。街头斗士没有改变时代，而仅仅是时代的产物。滚石唯一改变的，是让死寂的伦敦、让摇滚乐从此更加热闹，让他们从伦敦的穷小子成为一群富有的老头，而不是改变政治

和社会体制。（多年后，当年写公开信批判列侬、赞扬贾格尔的那位作者 John Hoyland 也说：“回头来看，当年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贾格尔只是想扮演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已。”）

但一九六八年之后的列侬却更加政治化，开始和小野洋子一道采取更多反战和平行动，穿上战斗气息浓厚的军装，写下更多抗议歌曲，并尝试在美国透过摇滚乐来凝聚青年文化的政治力量，直到被尼克松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

而今天，后来成为真正街头斗士的列侬已经远去，贾格尔却还在舞台上扭着屁股，唱着《街头斗士》，赚取着演唱会的巨额利润。

注释

[1] 他原本是要拍一出电影，希望找列侬扮演托洛斯基，但最终合作不成。

（张铁志：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节选自《时代的噪音》。原文链接：http://reading.caixin.com/102426/102435.html）

9-2 苗炜 刘宇：不安分的年轻人




“1968 年巴黎的 5 月充满了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汤姆 海登，上世纪 60 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还有‘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 年，一个 22 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 ·卡塞迪，1968 年 2 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 30 年、40 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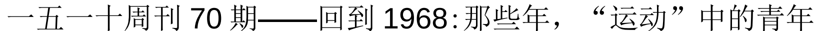
整个上世纪 60 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 年 10 月

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 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 3000 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

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1965 年 5 月 1 日，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登上玫瑰花车当选“五月之王”；他在布拉格朗诵，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留起了长发，还穿上了牛仔裤。1959 年，在《Quick》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蓝色约翰娜’的愿望”。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我在 60 年代只穿牛仔裤和 T 恤，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另一个“自由的标志”是平底凉鞋。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面孔》停刊了。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什么不可以写，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干。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五月之王》：“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但他又被驱逐了。

1968 年，基辛格在接受《LOOK》杂志的采访时说，“个人总是处于与社会的对抗之中。我理解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痛苦，他们没有道德偶像和英雄，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拒绝服兵役是对社会的破坏，越南战争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

马克 库兰斯基在他那本《震撼世界的 1968》中说，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份自己的英雄名单，只是这个名单上没有基辛格熟悉的人，其中不包括政治家、领导人和将军。上世纪 60 年代最让年轻人喜欢的作家是加缪，1960 年，加缪 47 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但年轻人喜欢看《西西弗神话》，审视自己处境的荒谬。他们还看《鼠疫》，这本讲述医生挽救城市的小说让青年人信奉行动。另一个在上世纪 60 年代被广泛引用的知识分子是马尔库塞。墨西哥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我看《单向度的人》，只看了 5 页，看《爱欲与文明》，实在太乏味，现



在我开始看他的另一本书，只因为我们反对的那位独裁总统说，目前的骚乱都是受这位哲学家影响的。”青年人的另一位思想偶像是法农，他 1961 年写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翻译成 25 种语言出版，他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马丁 路德 金当时就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思潮，他说:“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新左派的领袖人物汤姆 海登，1957 年上大学一年级，看了《在路上》就异常激动，他还说，是《鼠疫》这本书让他放弃记者的行当而投身社会活动。1968 年，中央情报局给林登 约翰逊总统递交一份 233 页的调查报告，题目叫《不安分的年轻人》，报告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非洲、亚洲各地的学生运动。报告说，要精确地寻找出这些运动的动机和趋向是失望的，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是受社会主义势力操纵和赞助的，他们蔑视苏联，也蔑视美国共产党。汤姆 海登本人对这份报告的判断倒也赞同，他说:“我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的偶像和先知是杜威、怀特 米尔斯和塞林格。”

那些旧日的小说与诗歌还会在今天的新闻中闪现。2007 年 12 月，伊丽莎白 哈德威克去世，享年 91 岁。她是诗人罗伯特 洛威尔的妻子，两人创办了《纽约书评》，当时是洛威尔以个人名义贷了 4000 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洛威尔也许是 1968 年最有名的美国诗人。那是富有诗意的一年，纽约城开通了一条诗歌声讯台，如果你想听诗朗诵，就拨个电话过去。2007 年 11 月，诺曼 梅勒去世，享年 84 岁。1967 年 10 月，美国反战联盟组织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战游行，诺曼 梅勒记录那次示威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在 1968 年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1968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 8 月 25 日在芝加哥举办代表大会，诺曼·梅勒作为《Esquire》杂志的记者出现在“异皮士”的抗议现场，他说过，是小说家创造了历史，“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接下来是言语的力量，一个人站在街头，向过往的路人，向围拢而来的群众发言。2007 年 7 月 14 日，这个星期六下午，有个家伙在波士顿公园演讲。如果听众中有人感到一种时间上的荒谬感，那再正常不过，因为演讲稿是 1971 年的，主题是呼吁全民抵抗越战。这个对历史演讲的重现是一种表演，题目为《休伦港 2:问题是全民服从》。表演过程制作成 DVD，也会在网络上发布。



这就是“休伦港计划”，对新左派运动中的各种演讲加以重现，每次重现都在原演讲地举行。这项计划由 Mark Tribe 组织策划，他谈到重现这些演讲的意义:“我们抗议攻打伊拉克，或抗议 WTO，却很难想象我们可以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事情。在上世纪 60 年代，人们似乎能够想象一种极其不同的未来。我们对这些乌托邦精神进行再体验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至少称得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受教养，现在生活在大学中，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汤姆 海登在《休伦港宣言》的开头说。1962 年 6 月，45 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 62 页的《休伦港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那些学生大多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如今，汤姆 海登这个左派青年已经成为一个左派老头，他在接受我们电子邮件采访的时候说:“休伦港宣言的宗旨是为了给每一个人更多的资格和空间去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权。它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体制，而是希望能增加个人、社区和体制之间的通路，如果必要，则需采取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这并不关乎社会主义，也不关乎资本主义，这只关乎人们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去寻求和创造民主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段回答可以看成是他 40 多年前宣言的重复，那时候他说，“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

1964 年 9 月 24 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2 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 萨维奥发起了“学生言论自由运动”。他站在校园里演讲的场景很容易就在 YouTube 上找到，得体的西装看上去像 Raf Simon 的裁剪。他担心培养思想贵族的场所变成一个就业培训班和工业人才的生产基地。“今天美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改变美国，我们整天为之焦虑的‘未来’和‘职业’正占据着我们智力和道德的荒芜地带。”他最著名的演讲是“个人对机器”，“机器”一词开始指的是工业生产与效率，接下来也会指向那些冲进校园逮捕学生的国民卫队，还会指向坦克和直升机以及更残酷的国家机器。“机器运转起来是如此丑恶。你要让自己躺在这个机器的齿轮、车轮、杠杆或是任何一种零件上。你要让它停止运作。你要告诉那些运转这台机器的人、拥有这台机器的人。除非你是自由的，否则这台机器将永远无法正常运转。”

当时校园里一位学哲学的女生被萨维奥的魅力打动，“他的魅力来自于诚挚，他不使用花言巧语，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意图。他不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雄辩的好口才，也不如海登那样有律师般的精确”。这个女学生嫁给了萨维奥，可如今掌管萨维奥基金会的是他的遗孀，名字和当年那女生不一样。革命总给男性带来浪漫色彩，革命带来的婚姻在海登身上更有戏剧性:简·方达离开资本主义大亨嫁给了这个革命青年，但上世纪 60 年代的浪潮平息之后，简·方达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大亨的怀抱。

2003 年 8 月 23 日，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纪念 40 年前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40 年前，劳尔是金博士 25 万听众中的一个，他是个大学生，担当着游行队伍的救护工作。他正要把一个脱水的妇女抬走的时候，金博士演讲开始了，他问那个妇女:“我们能停下来先听演讲吗？”那女人说:“可以。”劳尔就把她放到担架上，一起聆听。如今的劳尔是个社会活动家，为西班牙裔移民服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将某些人看作是次一等的体制。”

有一位当年的游行者可能是对只有几千人来集会感到不够热闹，他说:“1963 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网站，没有手机和传真机，我们只是行动。”而另一位 45 岁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则说:“现在示威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把 10 万人弄上街，有 10 万人点击某个网页，这就行了。”

在上世纪 60 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最有传播效力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这个演讲做出了解释，他说，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过，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埃里克·方纳说，民权运动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称为“高度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

这一番解读能说明《我有一个梦想》为什么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得到共鸣。左派老者海登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呼吁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推进全球性平等上，他说:“上

世纪 60 年代的那场学生运动的诉求在于，它鼓励人们去参与到那些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去，而 1968 年在全世界发生的各种运动中都有这样的诉求。1968 年最大的遗产在于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法律和文化标准，而这些在不断推动着人与人之间平等和人们的参与权力的深入。人们把上世纪 60 年代作为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物。你看，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还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追求，这些都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电子邮件中的单词，必须被老左派铿锵地朗诵出来才显得不那么空洞，必须以海登 40 来年未变的信念做注脚才会显得有一点价值，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解决赤贫问题，在我们的地球上，每天都有 30 亿人无法温饱。第二就是给工人、穷人、少数人种和弱势群体更多和政府沟通的可能，更多发言的机会。这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在何种社会体制、何种经济体制下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5 年夏天，新墨西哥州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马克·鲁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FBI 的一所培训学校邀请他去讲课。1970 到 1977 年间，这位教授是 FBI 的通缉犯。他现在给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讲代数，那时候他给工人阶级讲怎么干革命。他是 SDS 分裂之后的暴力组织"气象员"的领导者，他们囤积炸药，在政府部门实施爆炸，企图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这个组织的电影《地下气象员》2003 年公映。

FBI 邀请他讲课，以帮助警员们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心理。他征询朋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劝他别去，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到了 FBI 培训学校的讲台上。课堂上坐着 21 个中年警员，他们之中只有 3 个人看过《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鲁德教授开始回忆，他说越南战争是非正义的，学员们毫无反应。他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比较，21 个强壮的警员都把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言论。当他说到民权运动的时候，警察们依然毫无反应。培训班的老师想引导他谈谈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上的区别，但学员们对这些屁话没兴趣，一个警察直截了当地说:"你犯法了，我们就要抓你。"这让鲁德教授意识到他在和一帮国家机器打交道。他接着说 1968 年春天警察怎么在哥伦比亚大学殴打学生和旁观者，这次，警察们回应:"这不可能。""现在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鲁德教授说他这堂课有两个感受，第一是学员们对历史无知，他不得不经常来解释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名词；第二是学员们也没兴趣探讨理论和历史，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唯一认识就是，"那些人恨我们"。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升迁。

1968 年春天，20 岁的马克·鲁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刚从古巴归来，“那时候我们想表现得非常酷，当时世界上最酷的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那帮人”。他频繁参加各种会议，“5 年之内大概开了 1000 次会”。《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由大段对当年组织成员的采访构成，马克·鲁德说，历史总是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他已经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知道在美国不能搞暴力革命，他承认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有着更主流更深远的影响。“上世纪 60 年代我喜欢谈论革命，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也许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全部主题。

1968 年 4 月，在金博士遇害后，纽约哈莱姆区发生骚乱，黑人开始放火和抢劫，马克·鲁德目睹这一切，他相信这就是革命的开始。他组织同学们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他给校方的公开信说，所谓“代沟”，实质上就是战斗，“一方是控制一切的你们，另一方是感到被压迫、对你们控制的社会感到恶心的年轻人。我们将接管大学，接管这个世界”。

在金博士去世 40 周年之后，《今日美国》报重新踏访了当年发生骚乱的主要城市。堪萨斯城 3 天的骚乱造成 6 人死亡，312 栋大楼被毁坏。“自 1968 年以来，堪萨斯城的黑人过得并不好。”格温多林·格兰特说，他是堪萨斯城城市联盟主席，“在很多有关生活质量的地方，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公正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后……金博士梦想的东西其实没一个在这里实现。”在芝加哥的北朗戴尔，一位居民说，“这里有一些改进了，但是没人会想到要花上 40 年”。很多老居民说，金的死和骚乱才是北朗戴尔衰退的原因。

历史学家这样看待金博士:“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到处都是 10 大排名、明星和名人传记影片，将过去简化成为娱乐性或者神话。”“每个人都知道他那著名的演讲，但没有人能说出多一句的内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40 年前，贝·布托还是个要上大学的女生，她恳求父亲让她申请伯克利，但阿里·布托不同意，他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宜人，马萨诸塞州的冰雪将强迫你好好学习”。1968 年的骚乱也席卷巴基斯坦，为了平息骚乱，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贝·布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我对暴力还没有任何概念，然而，随着针对父亲的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我对世界才有了新的可怕的感触”。40 年后，她的命运再次印证，死亡威胁、腐败、暴力是她无法逃避的生活。

1968 年，监狱中的老布托给女儿写信:“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读读关于拿破仑 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 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 里德写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凯末尔、毛泽东的书，读一些印度古代史。此外，最重要的是要读读伊斯兰教的历史。”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教诲，也是一个长者让孩子在暴力的世界中寻求理性的支撑。

回头再看阿比 霍夫曼的演讲，里面不断涌现的脏字实在让人摸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但他的号召依然很有力量:“瞎分析什么，加入吧。”他为 1968 年 8 月准备的芝加哥“异皮士”聚会清单倒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有林肯公园里的舞蹈表演、音乐会，有沙滩派对——唱民歌、游泳、烧烤、做爱，还有诗歌朗诵和宗教仪式，有“异皮士”奥林匹克，有“异皮士”选美大赛。这个聚会是为了与共和党的芝加哥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占据了林肯公园，号召现在就开始革命。但在他们的示威活动开始之前，他们就听到了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消息，阿比 霍夫曼说，芝加哥变成了“捷克加哥”。布拉格的学生们问苏联的坦克兵:“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芝加哥的抗议者也询问警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在工作”。

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之后，汤姆 海登在某朋友家的起居室里看到了北爱尔兰人游行示威的电视新闻，“我开始感受到上世纪 60 年代是个世界性的运动。我 1967 年去过捷克，后来也一直和那里的学生保持联系。‘68 一代’到处都是”。40 年后，他注意到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阿比 霍夫曼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也变成现在对未来的一种遗产。是的，里根时代完全逆转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改革风潮。尽管他们成功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上世纪 60 年代是不会轻易地被人们忘掉的”。

他说:“我们现在纪念上世纪 60 年代运动的 40 周年，但这些纪念会被这 10 年来的当地事务和国际事务变得苍白。也许在上世纪 60 年代过去 50 年之后，在 2010 年，我们能更好地反思那个年代，而反思的立场无外三种:一是让 60 年代精神复活，二是彻底埋葬 60 年代，三是操纵那个 60 年代的故事为我所用。关键是你会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苗炜，《彭博商业周刊》编辑；刘宇，《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原文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原文链接：http://www.lifeweek.com.cn/2008/0407/21216.shtml）。

9-3 lily：1968 年街垒之战

“1986 年的时候曾经是 1968 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 邦迪写道：在 1968 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 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美国学生安妮•麦克德米在回忆起 1968 年的时候，这样描述那个巴黎的春天：街道上满目荒凉，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停在路的中间，街道标牌被推倒了，横在街上，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很多树木也有类似的命运，被砍倒了设置成路障，猫狗撕破的垃圾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尽管面貌丑陋，但 1968 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如今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判断依旧充满情感，法国官方版本认为：在燃烧的路障散发的玫瑰色光芒映照下，1968 年的街头上演的是无政府状态的闹剧，那些革命者除了制造了混乱什么也没得到，年轻人的反叛虽然行为过激，但加快了法兰西的现代性进程。

对于 1968 年其他地方的革命这种评价也许同样适用，在纽约、芝加哥、柏林和伦敦，年轻的激进分子们以幻想的热情进行着今天看来荒谬可笑的起义。这一年被认为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人们认为它会带领人类走向伟大的令人恐惧的另外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走向很多人希望的道路，虽然看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的孩子

1945 年后出生的婴儿们成长的世界与父辈截然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富裕，但战

后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偶尔的战争也发生在远离欧美的世界角落。战后也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1945 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对大萧条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只是听父辈们提起，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

物质富裕并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满意足，那些经历过 30 年代和 40 年代动荡的人们自然珍惜当前的安定，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懒散的满足感。在他们看来父辈们不过渴望生活得更舒适，满脑子是把屋子铺满地毯，用上中央空调，每天吃美味的牛排，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追求太过平庸乏味。1963 年，一个 17 岁的德国青年愤怒得抱怨：虚假的经济奇迹让人们认不清他们自己有多浅薄。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很快乐。《休伦港宣言》是实现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发表于 1962 年，宣言中说：他们要我们相信生活在繁荣中的美国人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

很多反叛者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性情温和，留着大胡子，涂黑色的眼影，浑身披挂象征着爱的珠子，离不开大麻，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他们自称是花的孩子，但是这些标志在老一代人眼里看来并不温和，墨西哥一个忧心忡忡的记者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死父亲的人。

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把生活方式的反叛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温德•布莱内斯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人人参与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见识能够改变美国。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某些学生领袖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

年轻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寻找灵感，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舒适的、平滑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表征。马尔库塞说随着技术进步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技术进步就像可以轻易开启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关闭一扇门。虽然像潮水一样涌现的新产品让人们面对很多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一点意义都没有，马尔库塞认为解决这种“不自由”的方法只有革命，只有打破现有的体系，真正的解放才可能到来。



1960 年的问题

20 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口无遮拦得谈论革命，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抗议，1964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取得了胜利，让官方承认了学生们有抱怨的权力，这对官方插手校园的政治活动是个限制。整个 60 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学生们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大学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厂。多数抗议者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课程的内容，食堂里的伙食质量，考试的压力等等，总之陈规陋习限制着学生的行为，这是年轻人反抗的中心问题。

1965 年 5 月越南战争扩大化，给了学生们新的借口和推动力。在美国尤其如此，越战可以说是年轻人个人反抗的动机，欧洲的学生也因为这场战争更加激进了，英国小说家安洁拉•卡特回忆说：因为越南战争，我们的未来变得阴晴不定。学生们自然而然的与越南平民站在一起，英国的学生们说：从我们考试的教室到越南的水稻田，看起来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它们折射了同样的社会类型，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上。

欧美各地的年轻人都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政治体系隐含缺陷的完整体现，学生们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结束这场冲突上，而是延伸到改变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要想攻击一个社会的根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SDS 的主席保罗•波特在 1965 年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想结束越南战争并且改变创造了战争的机制，那么美国人民就必须进行大众的社会运动。

继波特之后担任主席的卡尔•奥戈尔斯比继承了波特的思想，同样攻击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建制和批准了越南大屠杀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借用马尔库塞的思想，奥戈尔斯比把这称为“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通过阴谋诡计建立起来，让反动的权力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奥戈尔斯比呼吁美国人用革命的规则重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欲望给予我们真正的道德。他承认，有些人会认为他是敌视美国人的，但是他说不要因此责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大声宣扬自由主义价值从而让我的美国之心破碎的人。

回顾整个 60 年代，你会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声称发现了永恒的真理困惑不已，许多年之后再回顾他的经历，SDS 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承认：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这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这种为一代人发言的自豪来自那里，也许来自自我，极端



放大的自我。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希望的灯塔，是大众运动的光辉事例，是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失望情绪的解毒剂。年轻人对毛泽东主义并不了解就全盘接受了，越南的胡志明是另一个英雄，如果说美国是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胡志明就是是敢于对抗巨人并最终打败他的大卫。但是最令人尊敬的革命是切•格瓦拉领导的，他在古巴的革命说明了几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带领被欺凌践踏的人们到达传说中的“应许之地”。

暴力还是非暴力？

60 年代的反叛者敬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对非暴力有股宗教般的虔诚，很多学生来到南部参加民权运动的抗议游行。非暴力的思想也深深根植于欧洲土地，认为非暴力既是抗议的手段也是团结的工具。但是到了 60 年代中期，非暴力的策略失效了，因为它既不能结束在越南的战争，不能给予黑人自由，也不能赢得校园改革的胜利。失去耐心的学生渐渐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观念：自由主义的建制已经变成了“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专家。他们已经发展出能够容纳社会改变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传统形式的抗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给予人们主权在民的幻象。渐渐的年轻的叛逆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从自由主义的紧身衣下解放出来，年轻的激进分子得出结论：必须打破现有的社会体系。对很多人来说，这预示着抗议转向暴力的形式。

激进主义者认为暴露独裁政府本质的最好途径是激发面对面的对抗，从而揭下当权者暴力的伪装。暴力是通过是否愿意扔石头来测试的革命忠诚度，是某种兴奋剂，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的领袖马克•拉德不停的取笑人们胆小懦弱，他说你必须拿起枪，别再害怕，像个男子汉一样行动。德国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迪•杜屈克（Rudi Dutschke）也有类似的鼓动：我们并不是历史上毫无希望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傻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从没有过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战斗而且已经开始战斗，战斗就意味着自由。对杜屈克来说暴力是独裁主义统治的本质，革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回之于“反暴力”，谈论“宰头猪”变得和留长头发，穿牛仔裤一样流行。“右手一只枪，左手一只大麻”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五月风暴

到了 1968 年，激进主义者中的中坚分子厌倦了讨论和游行示威，他们把宝押在了暴力上。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中的头目自称行动派，这是一个崇尚虚无主义的小组，声称他们要用砖头、酒瓶、垃圾、长发、大粪、毒品、游戏、枪、自行车、火和做爱来打倒法律和秩序。“身体就是政治”，仿佛一个有魔力的咒语，变成了肆无忌惮、自我放纵的方便借口。

巴黎一家卖激进主义书籍的书店老板弗兰西•切瑞蒂说，我被 1968 年完全搞糊涂了，我对革命进程有自己的观念，但与眼前的这个完全不同，我看到学生们在建路障街垒，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革命所知甚少，有些不过是高中生，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另一个失望的激进分子纳加•泰尼克把 1968 年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场富人的孩子烧毁父亲汽车的起义。

这场让切瑞蒂和泰尼克感到失望的动乱起源于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学生们的疏离感，他们厌倦了人头拥挤的教室，把研究放在教学之前的教师和不民主的管理体制。1968 年巴黎的动荡从南泰尔开始，这是一处建在凄凉工人住宅区的新大学，在政府和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之后，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要建筑塔楼，政府立即宣布停课，这激起了多个大学里的教职工的支持性罢工。法兰西共产党开始并不想和学生搅在一起，后来发现政府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工会也这么想，出于对戴高乐总统的强烈不满，5 月 13 日，工人和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法国学生们尝试抗议运动就像尝试新的毒品，有条幅写道“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就越想做爱”。索邦神学院的一个占领者要求“随地小便的权力”，激进主义的导师让-雅克•勒贝尔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想重新定义生活的概念，语言的意义和政治表达的界限。在试图解释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破坏一切，我们想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使用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用来受教育的，还是用来吃饭、睡觉、做爱和吸毒的……我们要破坏消费性社会的结构，这也包括它的文化。正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 1848 年的欧洲革命那样：这场革命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极端荒谬。

现在回望巴黎事件，五月风暴看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因为它恰好与工会运动的高潮合流了，这在法国也是不寻常的。5 月 18 日，大约 600 万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这是

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对于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只要工人和学生步调一致走在一起，革命便会成功。理论上说，学生们极端崇拜工人阶级，实际上他们轻蔑粗暴得对待那些口中的“工人同志”。

五月风暴的领导者之一伊恩•登格勒发现索邦大学的厕所睹了，整个楼都臭烘烘的，他暗问自己，当革命成功之后，工人得到解放，谁来管那些下水道呢？工人与学生之间权宜之计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工人看不惯学生精英主义假内行的做派，而学生觉得工人就像群笨羊，正是这种不理解产生相互间的轻蔑。学生们从不为生计发愁，他们沉浸在深奥的政治理想中，但是面包对工人太重要了，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意识形态的幻想。当蓬皮杜首相在 5 月 27 日宣布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之后，工人们陆续回去干活了。盟友撤走，只留下学生在那里进退两难。三天后，戴高乐总统宣布下个月进行全国大选，随后弥漫法国的反叛情绪潮水般退去了。同一天，香槟丽舍大街上 100 万人举行支持政府的游行。

芝加哥风波

除了制造混乱，法国的学生们其实没有深远的计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马克•拉德是领导者之一，他后来承认：对于我们将做什么，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发生在 1968 年 4 月的暴动，表面上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卷入了武器核查问题，还有就是学生们要求在纽约黑人聚居的哈林区建体育馆。鲁迪后来承认：我们不过是顺手抓住了这些问题，国防分析研究所根本就与哥伦比亚大学毫无瓜葛，体育馆问题也是个幌子，对谁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从没到过要建造体育馆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怎么走。

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反叛者是被破坏的前景所吸引。“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鲁迪曾经大喊，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他的深刻，现在看来，这看起来空洞的句子恰恰解释了后来发生的混乱。

1000 名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进驻校园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暴动结束了，同时给学生们树立了暴力、效率和组织方面的榜样。鲁迪和他的朋友们对自己说，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证明了：政府宁愿逮捕、痛打学生，也不愿停止他们的剥削政策、种族歧视和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鲁迪认为这激化了对抗，海登随后号召更多的哥伦比亚人站出来，危机就要

到来了，将会有更多的大众支持我们，警察根本就对付不了。他说，我确信，我们正在逐渐掌握权力，掌握让这台不能为人类服务的机器停下来的权力。

1968 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大会为哥伦比亚激进分子开了头的暴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领头制造混乱的是易比派的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他们的计划是举行连续的街头聚会，这些聚会不像严肃的抗议更像是马戏团表演，主要目标是引起轰动，制造奇观。一个组织者说，这是典型的美国风格，我们投射在媒体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在民主大会的前一周，易比派对新闻媒体说他们要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里投放迷幻剂，要强奸大会代表的老婆，要在林肯公园里群交。鲁宾告诉他的追随者：政府的偏执和罪恶将会让他们派出几千个警察……记住警察越多，戏剧越精彩。

美国激进运动发生了分裂，那些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希望改革循序渐进的大多数人，闻到地下报纸散发的硝烟味之后，逃离了芝加哥。他们中的少数参加了大会，宣讲自己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观点，对暴力的介入表示反对。“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War in Vietnam，简称 MOBE)的大卫•德林杰痛苦得回忆：我希望这是一次非暴力的集会，对我来说，喊警察“猪”或者冲着警察模仿猪的叫声并不是革命。

除了造成破坏易比派没什么计划，但电视扩大传播了他们的形象。接下来的林肯公园夜，几千名警察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与一小撮易比派的乌合之众发生冲突，当时电视现场转播，整个世界都在观看。鲁宾和霍夫曼的疯狂和市长理查德•戴利的偏执相遇，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霍夫曼后来承认，我们要强奸政客在电视上的形象，所有的行为都是要败坏这个形象，这个民主社会和平的、有秩序的按商业需要运行的形象。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易比派赢了。

格罗夫纳广场暴动

1968 年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也怀着同样的动机。 发生在三月和 10 月的格罗夫纳广场暴动看起来非常“不英国”，事实证明这些暴动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是想要做点什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结果这不是种好的方式。对越南战争的不满

同样是问题的核心，由托洛茨基•阿里和帕特•乔丹是越南团结运动 (VSC)的核心人物，他们抓住了美国行动所激起的愤怒。10 年前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所举行的核裁军游行是非暴力的，现在游行的策略被抛弃了，抗议者拿起了棍棒和石头。有观察家把这场暴动描述为：足球流氓的聚众闹事。

像杜屈克和拉德一样，VSC 希望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全心全意相信暴力的力量。阿里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暴力本身的破坏力。地下刊物的记者约翰•霍普金斯发现 VSC 太愤世嫉俗了，他感觉到了危险，依赖乌合之众的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是炮灰吗”，他的提问直指阿里。

米克•贾格尔参加了格罗夫纳 广场的扔石头运动，然后他回到家写了《街头英雄》（Street lighting Man）。总有些人真心觉得应该去反抗，而有些人则喜欢听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英国这两种政治家总是存在，如果需要，偶尔他们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在伯克利的电报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1968 年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变得重要，1968 年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解读被观看的方式。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暴力只能让高深的政治理想窒息而死，同时赋予对方行事暴力的权力。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启迪普通人的心灵，激进运动常常让民众因恐惧仓皇而逃。英国的《星期日快报》这样描述格罗夫纳 广场 10 月事件：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易受骗的学生进行的冷酷、有预谋的暴力演习，是由训练有素的左派煽动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败坏警察的名誉，恐吓普通民众。

德国街头的暴动遭到了类似的谴责，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2％的人反对杜屈克等暴徒，更意味深长的是 78％的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德国工人阶级同样反对，在法国也是这样，在 6 月的全国大选中，戴高乐获得了全面胜利，并得到了采取行动压制抗议的授权。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类似，虽然国家暴力委员会认为 Daley 的芝加哥警察在行动中不受限制，不分青红皂白，但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谴责学生赞扬戴利。

1968 年的遗产

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把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看作正义的，平民百姓因为被激进分子吓坏了，

从而和政府站在了一边。法律和秩序变成了信条，受伤的是自由，政府对自己的偏狭越来越自信。右派的观念占了上峰，花的力量、毒品、性解放、学生动乱、共产主义、学院自由和反越战运动变成了堕落的标志，人们认为这些毒草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滋生的，只有回归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才能根除。领导这场回归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后来的总统里根，他多次为自己压制学生抗议辩护：当美国人在为祖国战斗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对敌人心慈手软。

60 年代的激进运动起源于社会思潮和年轻人试图实现这股思潮的努力，但是革命失败了，被保守派的反革命打败了。在战后最激进的年代，保守的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结束了备受指责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意义上，1968 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所有力量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力量最强，而是当它失败了，过去了，结束了，它的碎片却分散影响到所有的方向。

今天缅怀 1968 年已经成为左派的传统，要想得到左派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必须向杜屈克、霍夫曼、阿丽、勒贝尔表达敬意。1968 年的狂热分子并没有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伤害受到责难。1968 年暴动导致的道德恐慌让自由主义的共识轰然倒塌，同时让任何形式的改革停步不前。为了对付革命的阴影，尼克松和戴高乐（随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之后，即使是最温和的抗议也变得困难重重。

革命从来不在 1968 年的日程上，因为被暴力奴役，因为热爱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群困惑的革命者带领这股进步的运动脱离了常轨。也许这一年最持久的遗产是它成了替罪羊，整个西方世界，不管来自那个政治谱系的领导者都愿意把当前的社会问题：道德败坏、犯罪频仍、暴力事件和家庭困境推到那场革命头上，而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

尽管面貌丑陋，但 1968 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把灾难变成凯旋是典型的法国方式。1986 年的时候曾经是 1968 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 1968 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 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原文载于《世界博览》，原文链接:http://news.163.com/09/0615/19/5BSE3R5H00013EV3_3.html）。

【中】

9-4 谭全民：1968，无知的我们走向未知

“1968 年 12 月 28 日，我背着行李，忍住鼻子和心的酸楚，头也不回的走出西安市安居巷 26 号那扇破木门。我知道妈妈在后面，她一定是一脸的惊恐，不知儿子此去福兮祸兮。我知道爸爸在后面，他一脸的苍桑，不知该给儿子再说些什么。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走，无法选择。”



80 后、90 后的青年们，当你们在网络上说起“溅溅”语、打着酱油做俯卧撑时，请你们在我这篇回忆中了解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和状况。你们的时代才刚刚在我们的时代走出不久，了解我们会成熟你们。

在我上山下乡三年多离开插队的农村被招工回城时，县知青办给我的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阶级敌人恨，贫下中农爱”。没听过吧。在那个荒诞疯狂带着原始偏执的时代，每个人就是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你被迫把朋友当成敌人，必须去杀你本不想杀的人。那是一个制造敌人，以迫害作为革命实践，以精神疯狂作为社会时尚的年代。因此在我写这篇回顾文章时，我原谅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压根儿就不是他们的敌人）也请被我伤害过的人宽恕。（他们从来就不是我的敌人）文章写的是过去，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无论文中触动了谁的不快，至今你们都是我的爱。愿你们海涵天盖。四十年让我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相依相偎的活下去，不要对立不要仇恨。不要！

无知的我们走向未知

1968 年 12 月 28 日，我背着行李，忍住鼻子和心的酸楚，头也不回的走出西安市安居巷

26 号那扇破木门。我知道妈妈在后面，她一定是一脸的惊恐，不知儿子此去福兮祸兮。我知道爸爸在后面，他一脸的苍桑，不知该给儿子再说些什么。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走，无法选择。哥哥用到处搜集来的木板给我钉了一个箱子，表面太难看，用纸糊了一层。但很结实。他去送我，他同样不知我去何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早就开始了。政府发动那些与己无关的街道老太太、小学生和教师们敲锣打鼓地上家里动员。我不想去，就整天在外面躲避动员。敲锣打鼓的人到家里总是扑空。和我想法一样的人好多。可是不久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发表了。一锤定音。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威。我的命运从此奔向淳化，我二十岁的生命里压根就没听过这个名子，那是个矿石收音机时代。我要去的是什么鬼地方？

寒风凛冽，一长串拉着知青的大卡车从欢送的人群中驶过。马路上有人给车上扔宣传画。送行的人群抽泣着。一脸茫然的我们既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只是任由汽车拉着麻木地穿过大街。车一出城，开始飞也似地奔驰，风速加上车速，我和同学们都系紧了棉帽的带子袖着手。车上无人说话。过了咸阳桥，飞越周陵，闪过繁华的三原大镇，到广阔的泾三平原。我们抬头看见了远处的绰约山峦。我心不由一阵紧缩。我暗暗祈祷，万万不可进山。万万不可去那穷山恶水魂飞苦的地方。

但事实正好违背了我的心愿，也是所有人的心愿。汽车擦口镇而过，只一转，我们向平原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便是浑天地一片白雪，睹眼目四处障叠，四处盼顾无一人迹。车上的知青都哭了起来，女同学哭得尤其悲恸。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这时在心里念叨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但此时我的心比天降之雪，地结之冰，风给之寒还要冷。凄凉生悲给了我第一个打击。

但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想，只要是有人能活的地方，我也照样活下去。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没想着还能返城。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大家都默默选择着男女。此一去是斗转星移改天换地，还是隐没山林老死阡陌，谁人能知啊！

到石桥了，看见白雪覆盖的几间瓦房。里面冲出来四五个人敲了几下锣鼓，点响一鞭炮扔下就钻进屋去了。大概也冷得够呛。这里的人也有乐趣吗？这个问题一直被我带到县城，直到以后，我看到被改变的中国良心。

这是个狭小、破烂不堪的地方，汽车站里坑坑洼洼，到处泥水。车开进去晃得厉害。我们一路站在卡车的车厢里，腿酸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县城就是一条狭长的街，死气沉沉像个没睡醒的老汉。几乎看不到生命的迹象。这个破县也有一部伟大的县志和引为佳话的古今？但当我又坐上车，迎着越来越大的风雪爬坡时，我认定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一生将是体魄之劳苦灵魂之熬煎。那时我已经 21 岁了，失望之情戚然。但我不想趴下，我想挺起腰杆干活。

从县城走时，上来一个搭便车的，是县上的电影工作者。知青们争先恐后的寻问那一无所知的地方，猜测一无所知的生活。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再往上开地势会渐渐平坦下来。我们要去的十里塬公社就是一个东西十里的平原，而我要去的梁家庄更是全县有名的大村。那里有三百亩的苹果园，一年到头吃小麦。菜油何等多，猪肉何等贱。后来证明他部分的忽悠了我们。梁家庄实际叫晾驾庄，据说大宋年间皇上他老人家过此摆了圣驾。在神州总是有神圣，官到之处地动山摇，放个屁也记入史册。

汽车开始翻一架大沟，望沟壑连绵渺无人烟，不由我想起父母。我从高中开始对古诗词发生兴趣，这时便想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父母现在怎样了？是不是在家无言相对。翻过沟不多久，顺雪地远望，一片瓦房像个机关所在。汽车就在那里停下，高门头上有“淳化县十里塬人民公社”几个大字。下来车，我开始惶恐不安，我机械地向下搬行李，脑子里乱得像无端杂麻。如果是火坑，那到了。

开始分队了，我抓了一把雪在额上搓了搓，一旦降临了，即便是灭顶之灾、飞来横祸也只有挺身而战了。梁家庄早已派架子车来接我们了。随着他们的脚步，踩着没脚的雪，看大地茫茫然我心茫茫然时，有人说到了。哪儿呀？连房子也没有，怎么就到了？农民们神秘的又转过一个弯，把我们领到一个洞口，说：“这就是三队学生住的地方。”我带着天大的疑惑顺洞子下去。才发现这是从地面上向下挖了个方形大坑，四周打了窑洞。穴居啊！看看窑洞顶上黄土裂着大口子，那一夜我吓得无法入睡。大家都一样的怕窑塌下来，数夜不安。当晚的饭派到一家老太婆家，说是老太婆也就四十多岁，山里人显老，也有意打扮老些，因为早婚，三十多岁当奶奶也不少。可谁知到这个老太婆后来成了我的干妈，给了我真挚疼爱，让我终生难忘。

接连几天大队在村小学的土台子上演样板戏欢迎我们。山村的样板戏自有它们的特色。后来《沙家浜》里“报告司令，我们搜查了餐馆食堂厕所茅房，没有发现新四军。”《红灯记》中“奶奶我把密电码装到褡褡放到衩衩。”成为一时笑谈。

我不想卷入为什么逼我？

我们一行二十一个知识青年来到这个陕西北部山区县下乡插队。我时年已经二十一岁了。我们是在震耳的革命口号中，在那号称激情岁月的时代，如报上宣传的那样，抱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决心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一切交给党安排。实际上我们茫然不知今后是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高呼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却很苦闷一天两毛钱的收入怎么果腹？我们调侃，二十多岁了是不是要在农村找个老婆。每天艰苦劳作下来浑身酸软、还要去对付那些跳蚤、虱子的进攻。我们个个号称三军司令，满身虱子为坦克部队；一炕的跳蚤为导弹部队；饮水里的“鱼虫”那是海军部队。（告诉你们，那猪身上的虱子用砖头砸都砸不烂。）我最后练成了对付跳蚤的“一指禅”。只要发现跳蚤在我手指能及的范围内，一指摁住百打百中。一般人不可企及。

现实生活击碎了我们对从未见过的山区景象的新奇，一点都没体会到大有作为的使命感。对父母亲人的怀念对原来生活的怀念，最初那一段使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整天对月高歌“十五的月亮”；我们坐在大山沟的边缘高唱“一条小路”；我们躺在田野里向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借以排解心中的苦闷。可不久，我们就听到广播电台里播音员宏亮的声音：你们的月亮是升不起来的，你们的小路是走不通的，你们的姑娘也是不会到来的……我们真的晕了。我们远离父母在穷乡僻壤饿肚皮做苦力的生活也不得安宁。可是荷尔蒙不懂政治。知青男女都已成人，在他乡野外也不能不相互依存，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锅里吃饭，缝补浆洗、头疼脑热都要互相扶持。不管是不是资产阶级情调，我们之间不少人在体验青春恋爱的喜悦。没想到竟有一位荷尔蒙分泌更旺盛的青年社员因其土生土长的优势，以及和支部书记的亲戚关系，请出村党支书找我们女知青谈话。村支书对女知青说：毛主席让你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啥叫结合，就是和贫下中农结婚！天哪，像天塌了一样。当女知青回来把事情告诉我们时，我们简直傻了。这是逼婚？抢婚？毛主席说结合就是结婚？领袖的话有这么深奥吗？我们第一次遭遇了不能不应战的挑战。女青年纷纷逃回西安。我们自诩是比山民更了

不起的城市青年，那时打群架成风，手拿棍棒刀斧动辄上百人一阵混战踩坏几亩麦田不足为奇。于是男知青就去把要强迫女知青结婚的当地人修理了一下。后来事情虽有所缓和，但我们能感觉到，村党支部并未真正改变看法向知青们服输。这样，我们无可避免的和村党支部结怨，倒置了今后数年的风风雨雨。这能怪我们吗？最终让女知青安心插队的当然不是男知青"修理"的功劳。其时全国大量出现的强奸女知青的事件惊动了中央，一场严厉打击的运动震动了我们这个小山村。重刑之下，老乡们见到我们都开玩笑的说：你们知识青年跟军婚一样是高压电碰不得。

那时我们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那时把这五种人叫黑五类，他们的儿女叫狗崽子，后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天早晨要到村中央的毛主席语录碑前请罪，山村里的请罪活动也比城市来得朴素，只是那些"牛鬼蛇神"低头站在毛主席语录碑前不断念叨"劳动改造好、劳动改造好。"村里还揪出了几个"黑帮"分子，大约有五、六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因为在出身上找不出麻烦，就定为"黑帮"。我们知青很明白：我们不能参与这夹杂着宗族矛盾的斗争，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只是默默的劳动，听乡亲们讲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还有那三句话不离下半身让人脸红的怪话。我们想平静度过几年返城工作。可是，用一句当年的惯用语，叫"树欲静而风不止"，用如今电视剧的常用语，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命运的摆布，那是从几个下放干部来到村里开始。他们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的，那时全国上下"一打三反"运动风起云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发展。下放干部的到来，把城市白热化的斗争带到了这个山村。矛头直指村党支部。他们立刻想把知青发展成他们的同盟军和好帮手。于是他们到处找我们谈话。向我们讲全国上下革命形势，鼓励我们和他们一起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而我们躲之唯恐不及。我们六神无主，我们谁也得罪不起，我们下了工以后常常不回队里的住处，在外边乱跑，天黑后才回去，以躲避下放干部。但下放干部们却毫不松懈的寻找我们。而我们向他们表示：不想参与村里的斗争。

对村党支部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们只看到下放干部找我们的现象却不了解我们背后的态度。于是由村党支部发起的迫害开始了。这种迫害对我最为严重，那些最苦最累的活分给我去干，却不给我记工分。不给我分粮食。我去要，村干部就说：你还想吃哩？去搞背后的黑串联吧！他们就这样逼迫我走向他们的反面。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知青保持了中立。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样过平静的日子，我不想斗，我心惊胆战。在这天高皇帝远拳头是县官

的地方，我们象走进狮群的牛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村支部偏偏对我那么注重，整治的目标偏偏加在我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农民兄弟对我的评价是：滑。（当时我也懵了，一问才知道当地说滑，是有眼色的意思。说起有眼色，还有两个小故事。一次我干妈和队医生的丈母娘在我住的窑里聊天。我的那个破收音机在响，怕影响他们说话我就关了，就这个小眼色，那医生的丈母娘要把他的小女子嫁给我。还见了面呢。还有一次在某村开会，会议院里的老大娘在窖里吊水，院里那么多人只有我去帮他。也许其他当地人认为这是平淡稀松的事，谁家婆娘不吊水啊。但那一天，他们所有人都没喝上水。唯独我被老大娘叫到屋里，茶叶水啊。）还有就是事故硬。怎么理解这个事故硬？就是不受欺骗的意思吧。比如别的生产队偷分粮食知青不会知道，也不分给他们。对我，社员分多少也给我多少。也许和我干妈有一定关系，他们知道瞒不了我。就因这便要逼我害我？也事前和我谈谈啊！一个远离父母亲人的青年，却不得不改变以前暖昧中立的态度，一屁股坐在下放干部一边，以求自救。“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些语句今天的青年听起来一定感到很别扭，但当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并没有强烈的阶级觉悟或捍卫革命路线的出发点。我也不知道党支部书记就是后来的胡宗南特务。我只是感到受党支部迫害，没有退路，只有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才可能争取到好的出路以及人生的权利。当然，失败的风险像一把赌注，让我感到破釜沉舟的悲壮。一切都由不得我，冥冥之中我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命运还是不由分说的撕裂我，一切都由不得我——在那上山下乡的日子里。

下放干部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调查，引起强烈反弹。村支书和他的支持者利用祖祖辈辈留下的人脉、宗族关系，先后到县、地区领导机关告状，甚至去了一趟北京，想要告倒下放干部们。斗争进一步白热化，我也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我不知道谁能胜利，我只感觉到没有退路了，只能用生命赌明天。一部分知青游离事外，一部分心里支持我，暗地帮助我，虽没有一人和我并肩作战，从那时到现在我都感谢他们理解他们。他们并不是党支部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我好许多。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保卫自己的命运。我们还是好同学，同呼吸共命运的农友，有他们的同情，我满足。那一段时间生产队不给我记工分，别的知青跟着犁点玉米种子，然而我，被派去挖那雨天给地里拉粪车轮子压成的硬地。我也索性挖上几下就把破棉衣往硬地上一铺怠工睡觉。这一方面加重了党支部方面对我的不满，同时我也感觉到他们在观察我的表现。随着党支部告状成功的消息不断传来，对我的迫害变本加

厉，干脆就不给我派活干了。用現在的话说，我被边缘化了。我在村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村里的一切生产生活与我无关了。这意味着一但村支书取胜我将被逐出这个山村，或者被孤立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没有城市居民的粮本、粮票，一但被生产队抛弃将是无处吃喝、无处可走，基本上是置于死地。我唯一的退路就是逃到父母身边。我感到了恐惧。可是更让我恐惧的还在后头：因为村里斗争影响越来越大，上边派工作组到这个村来领导运动。我满怀希望工作组能来解救我，就让我当个普通知青吧！而这个工作组一来村里理都不理我，明确支持党支部。下放干部们也不和我联系了，隐身了。剩下了孤独的我，孤独，恐惧淹没了我。

你们下放干部不能这样啊！不能自己穿上救生衣跑了不管我啊！我是你们拉下水的啊！在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贫下中农座谈会上，有老乡激烈发言说：这个老谭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这顶帽子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有坐牢判刑的可能。困兽犹斗的我，那时把命也豁出去了。我把那几个“黑帮”青年叫来。他们和我一样是党支部加害的对象，我唯一可能的同盟军。用那时的话来说，我们同样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让他们卖掉家里喂的猪，把所有能拿的钱都拿上，第二天我们将殊死一搏。我们决定公开和村支部那一伙叫板。公开一决雌雄。没有发言权的黑帮我们在暗战中只有失败。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几人把写好的挑战大字报贴到村中央的语录碑上，向村党支部一帮人挑战。我们想把真相告诉广大贫下中农，揭露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真面目。我们作了好坏两手准备：如果对方出来辩论，其它“黑帮”兄弟不要说话，由我来辩论，那个时候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掉脑袋的。（曾经在县旅馆里，因停电有一个人边点蜡烛边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光明”。因此被判了刑。因为只有毛主席给我们带来光明。）我充分准备了包括支部书记在大灾之年把上级分配的种粮吃掉了等等材料，信心十足要在辩论中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如果对方依仗人多用武力制服我们怎么办？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根扁担或锄头。凭我们几个小伙子，一定能杀开血路一条，从此去走漫漫上京告状之路。

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对方没有一个人来应战。我们每人拿着一根扁担，威风凛凛的站在村中央，像一群赴死的战士。村民们远远地看我们、个别老乡经过我们跟前时就低下头加快脚步。这里似乎隐藏着危险。我还注意到专署和县上派来的工作组成员也到语录碑前转了一转，他们沒有说什么，但我看出他们眼神中的不安。在我心中工作组也是必须战胜的对手，但我知道他们有多么强大。其时，我已经视死如归。人被逼到这一步，如不想下跪也只好如此，谈不上英勇。我们在村中央等了一个多小时，对方显然被这背水一战的气势震惊

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两个小时过去了，没人敢到我们跟前来。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对手并没有那么强大。

就从那天开始，整个山村形势大变。我们的支持者不仅从地下转到公开，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上级工作组，他们依然不理不睬我们，他们手中的上方宝剑可以生死予夺。那时我二十二岁，父亲因为是国民党和母亲一起下放到陕南山区，他们住在一个小山包上，近六十岁了，要自己到山腰挑水吃。而我，一个强壮的儿子还要靠他们每月寄一二十元钱过日子。我在文革中曾和当过国民党军官的父亲划清界限。现在我突然明白，我在难中关注我生存状况的只有父母。我一生都在悔恨，我不知道当时给了父亲母亲多少打击。我罪不可赦。我常常“突然泪下顿成河”。我内外交困身心俱焚却不得不打起精神，我要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向父母尽孝。不久我又向更北边的山出发了。那里在修水库，全村的劳动力几乎都在那里，工作组要在那里召开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对村里的阶级斗争做出评估。我知道那个会议对我命运的意义。我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那里时会议正在召开，我一头闯了进去。马上有人说：他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我说：有，我是知识青年代表。工作组认可了。从此整个会议是队长及代表们和我的唇枪舌剑，在这里我不能不告诉大家，淳化这个地区是当年解放战争时的红白交界，红白拉锯的地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都有求生求活的本能。我们常常指责人立场不坚定，其实不对，他们立场很坚定，那就是保护自己。觉悟不高？其实觉悟很高，那还是保护自己。他们受指责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失败了。况且在这红白拉锯的地方，老百姓只有红的来了拥红，白的来了拥白。顺势而行更比一般人甚。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不少这样的人，上半年在红军是战斗英雄，下半年跑到白军里还是战斗英雄。就这样打几个来回。能用觉悟来解释吗？就包括一个生产队长的上下台，有不少社员那态度是太明显了。下台前一天还恭恭敬敬，一下台就敢骂。当时颇使我惊愕。所以在村支部得势时，许多人对我有意见我一点不觉奇怪。那过程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会议结束时有人给工作组说：人家学生嘴能翻。我说：事实谁也翻不了。那次会后，我和工作组的成员一起下山，一路上说了许多，我记得最清的是工作组长问我：你觉得你作的对吗？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就坚持下去。这一句话像茫茫黑夜让我看到了曙光。掉到无边大海中的我终于看见了船的桅杆。我感觉，我死不了了。

（谭全民：知青。本文原载于凤凰网，原文链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articles/detail_2011_08/19/8531428_0.shtml）。



9-5 谢盛友：我的 1968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



1968，我在干什么？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1968 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 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 ·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

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 笨，没真正弄懂几个词。到后来，国家拨乱反正，由于哥哥姐姐们“苦大仇深”，倍受注目，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的，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蹋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不完全统计(其实根本无法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中国的海归人才库。

啊，1968，我不喜欢你，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写于 1996 年 5 月，修改 于 2008 年 2 月 3 日，德国班贝克。

（谢盛友：记者，作家。原文载于爱思想网, 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516.html）。



9-6 朱学勤：思想上的失踪者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



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

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像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掏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

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

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

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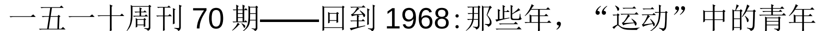
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



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

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那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

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一九六八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它类型其它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 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保存者，还是思想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雪窦寺下山后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同名书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文章链接：https://cochina.org/?p=6822 ）。

【汇】

9-7 孙冉：记忆 1968 年：中国青年的“反革命”噩梦



“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1968 年，之于法国老头的记忆是，“五月使你愉快”；而之于中国一代的印记却是，“无法告别”。

1968 年，老乔治和马克印都还是年轻人。前者出生于巴黎的 1934 年，后者出生于北京 1951 年。当他们把记忆拨回到那一年，同样目睹了疯狂的石头背后，却是不同的境味。

乔治·阿桑斯达克，是位摄影师，他打算在北京办个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的作品回顾展。所谓的“风暴”，只是中国人一贯的描述，在法国，只是“mai”，五月的意思，就像刚刚过去平常的日子。

而马克印，是在北京 1968 年的亲历者，在民间，他们自称知青，标示着伤痕。

当那些发生在 1968 年法国的照片，隆重地裱在墙上，那个法国老头的心轻松得很，那是他愉快的 5 月，他觉得法兰西自此敞开了道路。而马克印的心却不由得一抽，那是让他这些年想忘记，却又无法告别的记忆。

照片里，一个法国青年手里的铺路石，划着完美的曲线飞向对面警车，看在马克印眼里的，却是跨越时空，带着愤怒，砸破了他们家的玻璃。1968 年，在法国损失的是警车，而在中国，遭殃的是马克印这样的家庭。

如今，那块法国石头最终砸出了法国社会的变革，比如带薪假期和工资的上涨。而在中国，那些石头留下的，唯有伤痛和令人不安的记忆。



法国年轻人的浪漫政治梦

乔治是出生于巴黎的波兰裔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身份的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他们时常失去身份。

事实上，乔治的父母最初都是俄国的犹太人。那还是 19 世纪末，庞大的犹太人口，让沙皇严重觉得对这些“威尼斯商人”的处置是个问题。于是，1881 年，借口犹太人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集体放逐，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在如今的乔治看来，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1917 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多半也出于投机，红色革命的队伍里依旧容不下犹太人，最终父亲还是被流放了。

逃到巴黎，日子安定了，父亲遇到了母亲。那时候巴黎聚集着大批犹太人，他们试图从这里奔向美国或者中东。而乔治的父亲，因为他的随遇而安，留在了这里。

1934 年乔治出生，不久，二战爆发，一家人再度流亡，那些年，父母带着他在欧洲辗转了 13 个国家，身份像眼前的路充满了不一定。

不记得是在波兰，还是意大利，父母把他放在一个农民家，还给了人家一叠钱，自此一年多失去联络，乔治曾以为自己被卖了。

自此，乔治就很在乎变动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时常惶恐、眼神不安。

好在二战结束了，一家人又生活在了巴黎。

父母做起了生意，他们希望乔治成为一个小裁缝。战后，在巴黎，时尚复苏得比经济快得多，裁缝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而犹太人的下一代，却不安于小裁缝的职业。那时候，在巴黎，小市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变了。

在他们眼里，旧世界的规则已经过时，宗教在这一代的眼里已经被超前的伦理观念彻底削弱了。

“松开裤腰带，要做爱，不要作战。”“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叫自由。”

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不止是法国的青年，整个西方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对抗着严峻。

乔治也不例外，这让他的母亲一度很伤心。在几个朋友的唆使下，乔治迷上了摄影——这个烧钱的嗜好。不久，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共产党的报纸里做摄影记者。

乔治最初信仰的是法共，但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尤其遵循的是懒洋洋的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完全缺乏想象力。这让乔治开始向古巴和北京的革命道路漂移，毕竟后者更对青年人的胃口。这一点，乔治仿佛与他父亲颇为相似。

他们吸着玉米纸卷的高卢牌香烟，听比利的歌曲。在地图上寻找越南，迷信“毛主义”，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蠢蠢欲动。

而最完美的记忆是，他不久即被派往了古巴，参加国际青年交流团。在那里他待了 3 个月，见到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切 格瓦拉。他至今还相信，是他最早拍摄了这对革命者。

他从古巴带回来的摄影报道，让法国的年轻人眼前一亮，革命竟然可以抽着雪茄如此浪漫地去搞。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是，“毛的不讲卫生”。乔治很早就知道了毛，那是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让这个法国年轻人印象至深的是，毛一边跟记者说话，一边抓虱子。乔治当时的感觉是，帅呆了。

1968 年，乔治做梦都想来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拿着红宝书，在革命的汪洋大海里走在最前头，那才是青春。

可 1968 年，在中国青年马克印的回忆从来都不浪漫。

马克印的身份同样复杂，他们家是满族，正黄旗后裔，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分的时候，爷爷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马家 11 个孩子，马克印最小。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马克印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即使风向再变，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有他家的后路。老头子惟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机会分子，自此劫数难逃。

革命的起因，在马克印那些年轻人起初看来，就是“毛主席”受欺负了，他老人家身边有叛徒。1966 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和老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学校里的坏蛋——老师和校长不久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到了 8 月，红卫兵需要新目标，大手一挥，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于是，那块疯狂的石头就飞向了马克印他们家，起先他还以为，是他们家的枣树招人妒嫉。

1966 年 8 月 25 日，马克印正上初二，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的家前后两进，五百多平方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马克印的家历史上有问题，这是早就定了性的。他两个哥哥在台湾，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也不错，周围的人都嫉妒。到了 1966 年，群众们开始反映他家有枪。

这只是开始，到了 9 月 2 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听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那些红卫兵才不管，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偌大的院子，贴了封条就剩下马克印一个人。

这一住就是 2 年，直至 1968 年。当时，在法国正是年轻人愉快的春天，而在北京却是那一代最后的疯狂。这年底，上山下乡开始了，年轻人们经历着最乱的

巴黎在 1968 的记忆

巴黎最初的一块石头来自于农泰尔文学院，这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

这个学校从 1967 年 12 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学生的领袖是“红毛丹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地点是学校新建的游泳池。

1 月 8 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来到这里视察。

这位部长，此前刚刚因为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而成为法国年轻一代不满的对象。在这本书里，教育部门对法国的青年下的结论是，他们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

这显然惹恼了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就在这位部长站在大学生们跟前演讲的时候，“红毛丹尼” 靠近他，愤怒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 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也不示弱，他答，“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效果一点都不幽默。

“红毛丹尼”说，他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

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红毛丹尼”成了挑战权威的勇者，而部长的权威彻底丢失了。

学生们与权威形成了对峙，谁都不让步，后来学生们占领了校园的行政楼。

矛盾不止在教育界，戴高乐执政时代的经济困境让工人们也一肚子的不满意。

巴黎的工人也与政府时有走火。1 月 26 日，在富惹尔，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它们代表着去年关闭的十家企业。

到了 5 月，示威从学校蔓延到了巴黎街头。

5 月 6 日，星期一，巴黎的左派分子正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150 周年。学生们走出校园，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第一颗铺路石飞向与之对峙的警察，骚乱开始了。

乔治当时正在左派的《工人报》做摄影记者，那个早上他感觉巴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街了，包括他。

事实上，不止是巴黎，在那个 5 月，在米兰、佛罗伦萨、伦敦、汉堡，西欧的年轻人们都闹起来了，他们要求，“采取巴黎式的积极占领大学”。

那一年巴黎的 5 月运动，总共死了 3 个人，有一个是出了意外，为躲警察而掉到塞纳河里淹死。

经历那么多革命，法国人的暴力还是挺成熟、挺习惯的，学生们当年扔石头、纵火，但一切还是点到为止，和警察们你来我往，除了声势，没有真的拼命的，把街头运动博弈到恰到好处。到了月底，学生们随即见好就收。

老乔治自从经历见证了法国 1968 年的 5 月风暴后，就成了一个激进的左派。在他看来，学生们的这些牺牲是值得的，毕竟为法国人换来了之后的带薪假期和工资上涨。

为了不要忘却的纪念

1968 年 5 月 31 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有这么一则新闻：西欧学生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当时，马克印还看不到《参考消息》，他倒是在广播中听到了巴黎学生动起来的消息。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让革命变了味，武斗刹不住了。

前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黑五类们站出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打人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死人无数。到了 1968 年，红卫兵失势，大多都串联去了。社会青年开始收拾剩下的红小兵，到了后来，就是简单的打群架，扒军装，飞军帽，抢自行车。

那时候马克印吓得不敢出门，一来天生胆小，二来他要看着祖上留下来的宅子。

这一年的 9 月份，上山下乡开始了。马克印也报名去了内蒙。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他这个家庭背景，肯定有去无回。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黑五类了，与其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或许到乡下换个环境能闯出一番天地。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好，但到了 1973 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在内蒙生活。

安置办的人也不瞒他，当着他的面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惟独你走不了，你在这里估计得一辈子。

马克印自此绝望，当时旗里有家铁业合作社招工，就是做土簸箕的，知道他的成分都不要他。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是红五类，父亲当时是商务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姑娘的父亲给知青点打了招呼，旗里竟然不给办。到了 1974 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对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

中意的姑娘走了，知青们也走了，经家人介绍，马克印和一北京知青结了婚。直到 1976 年，马克印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

老乔治一直向往着来北京，到了 1982 年、梦想终于实现。在北京，他不断地寻找 1968 年的痕迹，他跟拍着大街上拿着大哥大，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青年们，他们是这个国家 1968 年后出生的一代，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1968 年还有着浪漫的色彩，那一年已经被符号化了，成了五角星、老像章和毛的头像。

老乔治的展览，马克印看了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

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如今，马在顺义的山沟里建了一个知青部落，把当年自己在内蒙用过的东西都搬了来，他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不要忘却。

（孙冉：中国新闻社驻日记者，原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8/12-31/1510703.shtml）。

9-8 徐友渔：西方学生的 1968 和中国学生的 1968



“中国学生还是有好的一面，虽然是完全盲目的个人崇拜，誓死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到 1968 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学生已经开始考虑文化革命到底对不对、文化革命是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最新的革命、是不是彻底建立新社会的革命？”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青年发展讲坛”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徐友渔老师。徐老师是从百忙之中赶过来给我们做报告的，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徐老师是数学系出身，后来研究哲学，可谓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所以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文章。徐老师写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 20 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许多优秀的著作。徐老师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曾经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名校做过访问学者，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

下面，让我们欢迎徐老师给我们讲述西方学生的 1968 和中国学生的 1968。谢谢！

徐友渔：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一道，谈一下西方学生的 1968 跟中国学生的 1968。今年是 2008 年，离 1968 年那个轰轰烈烈的日子刚好是 40 周年，大家都很关注这么一个日子，因为它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发展中还是留下很深刻的烙印，我们国家很多报刊都做了这种栏目，比方我随便拿一份，它上面叫做《1968——燃烧的 40 年》。在大家的心目中，1968 年是青年学生在一种青春期的情况下，对于学校的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的一种造反。而且大家心目中的印象是中国学生在 1968 年跟西方学生在 1968 年，他们都是有同样造反的行动，在同样的心理行为支配之下，在同样的文化、社会因素的支配下造反，年轻的学生处在青春期的懵懂之中，对这也不满，对那也不满，大家都造反，而且造反的背景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跟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不喜欢像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报刊上，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是年轻人带着一种情绪性，莫名其妙地在那里造反，而且他们造反都是同样一个模式。我自己实际上也是亲历者，1968 年的时候，我应该是 21 岁，应该也比较懂事，我自己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研究的结果跟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各种造反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造反跟西方的造反有非常大的差别；第二，与其说年轻人怀着一种青春期的躁动，非常懵懂地对自己的不满，这么一个非常一般、非常不准确的说法，不如说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化教育方面的原因，他们造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最后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讲的主题虽然都叫做 1968 年，但是在不同国度，尤其中国跟西方学生他们造反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法国学生在 1968 年的造反是跟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反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学生的造反基本上可以说是追随民权运动。法国学生的造反是来得非常快，去得也非常快，基本上就体现在 1968 年，甚至更集中地体现在 1968 年的 5 月，法国学生造反的另外一个代名词是“五月风暴”；美国学生的造反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完全没有体现在 1968 年；而中国学生跟现在一般的、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国学生到了 1968 年，实际上是结束了他们的造反行动，而且对自己前面一两年的造反行为有了一个很深入的批判性的反思，他们重新思考自己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间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重新思考中国的命运跟前途，而且他们这种思考的主流已经背离了文化革命的官方的路线。实际上，这种东西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本划分一下中国学生在 1968 年跟西方学生的造反，能够看出这么一个特点：西方学生的造反实际上带有非常明显、非常强烈的自发性，也就是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根据自己的认识起来造反的，而中国学生的自发性跟主动性不强。实际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这种造反实际上最根本的支配心理是过度迷信和过度崇拜。因为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因为党中央号召我们造反，这种造反不是自发的，而是响应号召。也就是说，当初中国这一代学生的造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实际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西方的造反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第一，我要讲的是学生造反的国家在 1968 年的思想是什么样的；第二，讲美国学生，讲他们的思想体系是怎样的，再讲他们造成的社会后果；第三，讲中国学生的造反，我想特别要强调：中国学生在 1968 年的时候，他们跟西方学生处在完全不同的思

想阶段；第四部分，讲中国学生跟西方学生在 1968 年这么一个同样的年代、同一代人，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当他们这些同一代的人碰到一起，回顾和反思自己当年造反的时候，他们思想上发生了哪些碰撞，产生了哪些火花，他们之间的思想是深深的共鸣、高度的一致，还是处在非常对立的地位？他们实际上对自己造反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五，1968 年到底给我们现在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代人在现代社会起的作用，他们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部分，法国学生在 1968 年造反的情况。

法国学生这种造反像狂飙突进运动一样，来得非常快，去得也非常快，完全像法国的浪漫、热情。法国学生造反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日子，就是 1968 年的 5 月 3 日。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就大规模爆发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国学生也不是突然之间从 5 月 3 号就产生了学生造反的运动，这个运动从 1968 年的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很多大学发生了很多骚动，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学生骚动，法国政府就派警察到学校调查学生的活动、监视学生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 1968 年 3 月 22 号，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在巴黎大学南泰尔学院，开了一个学生组织的会议，就是讨论当前的形势，考虑学生怎么对付派到学校的警察，反抗他们的监视跟调查。也就在这一天，1968 年 3 月 22 号，在南泰尔学院，学生就造反了，他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而且学生也组织起来，形成核心的队伍，散发传单。这种革命的意向表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模仿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革命的时候，把自己的运动命名为“7•26 革命运动”，就是 7 月 26 号那天起事的。法国的学生就把自己这一天的运动称为是“3•22 运动”，就是 1968 年 3 月 22 号作为标志，法国的学生运动从南泰尔学院开始爆发。

到了 5 月 3 号，在南泰尔学院，几百名学生聚会，抗议大学当局跟法国政府对他们的这种监视，他们就在学校举行这种抗议活动。这时候警察开进了学校，开始抓捕学生领袖，抓捕了好几百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运动一下子就触发了：警察就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就捡地上的砖头向警察扔。到了晚上，这种革命形势一目了然。法国有这么个传统：一出事，大家



就都在大街上筑监狱。这让我想起 1848 年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书里面描写到欧洲那段时间的风潮时都有这种情况。法国有这么一个传统，一出事就在大街上修监狱，修一座比较坚固的堡垒，为了阻止警察跟军队的争斗。实际上在 1968 年的条件下，那只具有革命的象征意义，它的军事意义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设想一下，现在要是在大街上修一座监狱，那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当时就是有一个强烈的革命象征意义。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说“五月风暴”的出现是有必然原因的，就是学生对学校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首先一个情况，说到这里，跟中国现代的情况有一点相似，就是刚好碰到二战之后的“婴儿潮”，就是人口大量出生的时代，那时候正好 23 岁，碰到 1968 年，导致那时候学校的学生人数急剧增长，但是教学设备、老师的数量跟不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学校的功课、生活太难，学生疲于应付。

对于法国学生来说还有一个因素，那时候法国虽然是欧洲国家，禁欲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有非常严格的界限的，男同学不能到女同学的寝室里面去，女同学不能到男同学的寝室里面去。阻碍他们交往，学生对这方面非常在意，好像这是对他们人性跟自由的极大压制。所以综合所有的因素，造反就这么出现了。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素，法国的警察跟政府当局对形势估计错误，古今中外这种形势是非常之多的，年轻人对很多事情表示不满，感到有压力，他想发泄，有的时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从政府和警察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像政府统治一样，他们把敌情估计得非常严重，总是觉得要出大乱子，或者有人要出阴谋诡计，有预谋，要干什么事情。就派警察到校园里去。实际上是政府当局和警察的行为激发了这种矛盾。如果警察和政府不是采取这种高压过激的行为还会不会这样？这确实是非常难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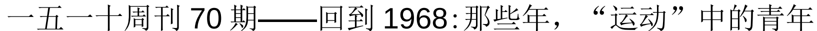
但对于学生来说，尤其对于法国这种有着自由传统的学生来说，大学绝对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独立的场所，把警察派到学校里来，学生感到受不了，他们觉得不能容忍，警察和军队是不能开到大学里来的，破坏了这种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要起来斗争。本来学生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而且学生个人之间思想取向也是不同的，学生跟老师之间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政府的这种高压的态度跟警察开到学校去这一点，把所有的学生都激怒了，所有学生之间、派别之间、还有学生跟老师之间，他们的差异就显得非常不重要了，他们马上齐心在一起，战争就爆发了。

到了 5 月 6 号的时候，事态越来越大，上万名学生在巴黎举行大游行，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这种学生的集会跟示威活动受到了警察的镇压，发生了冲突，很多很多冲突。法国学生有这种革命的传统，学生就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情的真相、说明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富裕工人对学生加以支持。大学里面，大学教师跟教授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面去，甚至中学生也站出来支持大学的学生进行造反活动。

法国有这么一个特点：它的革命跟造反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大学生聚集起来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以后，就得到了巴黎各阶层的支持。比方有些著名的左翼支持分子，法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和他的女伴波伏娃就组织了一个组织来支持学生，这个组织名字叫做“支持压制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表示支持。另外有五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给政府写公开信，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国的工人也有这种反抗的传统，马上就响应法国学生，马上站出来，大规模地在大街上游行，表示支持学生。工人的诉求有两点，第一点，他们是支持学生的，所以工人的标语是警察要撤出学校，反对处罚学生；另外也提出自己利益上的诉求，就是要结束失业，要增加我们的工资。所以工人运动一下子也起来了。

这种斗争发生到高潮、最尖锐的时候是 5 月 10 号，因为警察不断地往大学开，学生就下定了决心。就跟我们现在的海淀区一样，法国塞纳河的左岸，是学校、大学、教育文化中心集中的地方，是法国整个文化精华之所在的一个地方。警察开到那个地方，学生们就不干了，这块是我们高等学府集中的地方，这是我们文化荟萃的地方。他们下定决心，这个地方绝对不能给警察占了。所以学生就要保卫塞纳湖畔的左岸，警察就蜂拥而至，一大批一大批，接着警察就镇压学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就用石块来还击，把小汽车也砸了，路上的大树也被砍下来，这种冲突非常厉害。整个晚上，巴黎整个就是火光冲天，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烟雾。受伤的学生超过上千人，而且有接近 500 人被抓，事情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就非常理性地退出了，他们开始妥协。这次的法国学生运动是一个很幸运的短暂的胜利。当时法国的总理蓬皮杜是一个有着非常高文化修养的人，他自己也写诗、写小说。当时法国的总统是戴高乐，他的态度应该说更强硬一点，但是戴高乐当时故意处在第二线，让总理蓬皮杜来处理这个事。5 月 10 号，学生跟警察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爆发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过了半天，5 月 11 号晚上，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所有大学要重新开放，而且提出不要惩罚学生，他们接受了学生的诉求，让法院来



判决对学生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撤销。他还许诺：政府要跟学生、教师一道，对大学进行调查，要进行认认真真的大学的制度改革。这一讲话就被理解成是政府对学生的让步，学生兴高采烈地庆祝各自的胜利；警察就垂头丧气，觉得他们正在替政府卖命的时候，结果政府自己妥协了。这个时候，警察马上接到政府的命令，马上从学校里撤出去，学生重新占领了整个校园。

过了 20 天，就是到了 5 月 30 号，具有非常高的政治威信的总统——戴高乐出面了，他首先召集内部开会，他也在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受到一些操纵、支持的，他说整个法国已经受到集权主义的威胁，要求这些爱国的人们要站出来，不应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要支持政府。在戴高乐的呼吁之下，法国的那些倾向于比较保守、比较右倾的力量展现了他们的力量。那些在学生运动发生时保持沉默的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走向大街也进行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和标语就是反对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这样整个形势就发生逆转。这是五月底的事情。

到了 6 月，整个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同时都处在衰弱的状态，学生的运动结束了，工人的罢工也结束了。原因有很多，一个是工人罢工的热情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中外群众的运动都会存在的，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走上暴力以后，往往会丧失理性，控制不住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这种暴力事件越多，就越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内部分裂越多，大家意见越不一致。革命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总结的话，可以说法国学生的造反、1968 年 5 月份的造反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狂飙突进的运动。虽然很激进，他们思想、行动很激进，但是由于政府、军队跟警察，他们是非常理性跟克制的，所以就没有发生枪杀事件跟流血事件。所以整个“五月风暴”在历史上并不是作为一个惨案记载在史册上。对照一下，在中国则有流血事件，如五卅惨案什么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由于这种克制跟理性的态度，法国学生造反这件事就这么平平静静地结束了。后来蓬皮杜有一封私人信件写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法国很著名的右派政治理论家，叫威尔达，他就提到，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我们得不到舆论支持的话，是绝不能使用武力的。我不能想象，世界上学生再闹得天翻地覆，再闹天大的乱子，闹得再不满意，在我的脑袋里面都不能考虑（去使用武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你这么做是得不到舆论的支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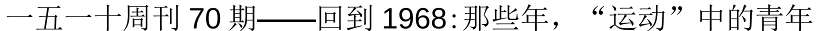
学生自己是怎么看待这种造反的？社会上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他们认为“五月风暴”的起因，是学生对现状的不满意，这有很多原因。比如学生的人数过多，学校的老师太少或者教学设备落后，寝室之间又不能出现串联。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学生感到自己在社会上是没有权利的。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利，他们便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去参与社会、去控制社会，因为没有发言权，整个社会跟他们没关系。所以他们的整个活动从本质上是一种要求民主参与的活动。

学生的各种不满，是要改变自己这种没有权利、没有利益的命运和地位。但社会上另外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他们的父母又是怎么看待？有一个右派家长对学生运动是这么说的，他说：1968 年你们都处在 20 岁上下，你们在这个年纪是最慷慨的阶段，也是最轻率的阶段，你们在人生这个阶段，人格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你们的性格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你们处在青少年时期，性格是没有定性的、晕晕乎乎的、忧心忡忡的，自以为是关心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权力有兴趣的人们，笼络你们，利用你们，甚至牺牲你们的利益。我理解你们要求权利、要求民主参与、要求参与对社会的决策和控制的想法，你们有渴望的权利，你们有一份要求自由的权利，这是对的。但是，你们要懂得：你们的权利应该怎么得到？应该通过投票箱来得到，你们的诉求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话，通过投票箱你们是可以获得的，你们不可能在大街上获得权利。这些话是很有意思的，它既解释了学生造反的动力，也解释了整个社会怎么看待这起运动。

第二部分，美国青年学生的造反。

法国学生的造反是一个狂飙突进运动，来得快、去得快，美国学生的造反时间持续得要长得多。如果说法国学生的造反，实际上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动乱，比如跟工人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了。美国学生的造反基本上是一个校园的造反，而且它的诉求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艺术这些方面。

谈到美国学生造反，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美国学生在 1968 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激进造反运动，但是免不了大家会奇怪，大家印象中觉得美国是一个相当保守、相当讲究实力的这么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发生造反，德国有个很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巴



特，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甚至写了一本书《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的传统应当说是相当保守的，跟造反是格格不入的，那怎么会发生造反呢？这种印象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美国的社会是相当平稳、相当保守、相当维护秩序跟稳定的，但是美国的思想传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源远流长的激进思潮，这种激进的、需要改造社会的思潮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更多，出现了一整代人，这一代就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而且“垮掉的一代”这一文学艺术流派在美国是风靡一时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诗人叫金斯堡，还有小说家凯鲁亚克，还有博罗斯这些人，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中产阶级式的、平平安安的、保守的那些人，他们鼓吹要过一种非常反叛的生活，甚至从衣着打扮到行为方式，完全跟传统彻底决裂。所以从思想文化这个纬度上来讲，美国这种激进的思潮是非常厉害的。美国的大学生完全有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就是要跟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刀两断，我就是要寻找另外的路。

美国还有两个很特殊的原因，成为青年学生造反的源泉。一个原因是，美国在 60 年代跟苏联战争，学生是要反战的，谁也不愿意到战场上去送死；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是一种很不公正的事情，不但黑人要反抗，（因为）他直接受压迫，就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白人，他们也表示要改变这种歧视人的制度跟政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实际上，美国社会蕴含的这种造反的思潮是非常强烈的。

1968 年的学生造反，可以回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最明显的时间段是 1962 年的 6 月，美国当时有一个长期的学生组织，是一个很激进的学生组织，它的名字叫“争取民主学生社会”，在 1962 年 6 月的时候，这个社团的代表到美国的密歇根州休伦港那个地方去，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休伦港宣言》，是激进造反的宣言。这个宣言对美国的现状、美国的社会制度跟政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表示这个社会是不公正、不民主的，他们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要确保个人参与到社会的进程里面去。这个宣言成为了 60 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而且这个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文献。我们中国也翻译了一本书叫做《美国读本》，就是把美国包括《独立宣言》等经典的影响美国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些经典性的文字都收集在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做进一步研究的话，可以在《美国读本》里看到这篇《休伦港宣言》。

这个学生组织——“争取民主学生社会”——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而且成了领导美国学生造反的核心力量。到了 1968 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成员超过了 10 万人。这是 1962 年的事情。

到了 1964 年，《休伦港宣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报上发表了，这样，学生运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爆发了。大家知道，加尼福尼亚大学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左翼激进传统是非常强烈的。在美国，包括在欧洲，都有这种情况：越是名牌的大学，左翼教派的情绪越厉害。为什么？因为学校，尤其是加尼福尼亚这种学校，总会有一些学生对现状不满，要进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激烈活动，而这些活动遭到了大学当局的压制，大学当局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好好念书，而且你们的活动实际上是触犯校规、违反校规的，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希望自由自在地活动，大学当局又发出各种清规戒律进行压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点出格的学生也被开除掉，或者对这样的行为给予警告。这样的冲突在加尼福尼亚大学越来越严重，最后，警察大规模地进入了这个学校，开始抓学生，抓了将近 1000 人。大学里面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大学评议会，这是由教授组成的，在最高的领导中，大学的教授都支持学生。学校行政当局是压制学生的，但是大学评议会绝大多数的教授都是支持学生的。

后来这件事，在 1964 年的时候，根据大学评议会，就提议把这个学校的行政领导人更换掉，新的领导人对学生采取了新的做法，基本上满足了学生提出的要求。这就是学生运动在学校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在 1964 年，可以看成是 1968 年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一个先声。到了 1968 年春天的时候，标准的 1968 年学生造反在美国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原因是什么？美国整个社会气氛、传统跟中国是相反的，美国学生特别讨厌军方在学校活动，我们的传统则相反，也许会感到光荣，有一个什么爱国的机会，美国学生就不满意。在哥伦比亚大学，军方在学校建立了海军后备役军官的训练队，海军在招募人员，这是一个事情。军方又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军事研究所。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制造化学武器，尤其制造油气的，也在大学里面招募有化学知识背景的学生。这些让在大学里的学生非常不满意，他们就在学校里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学校很著名、很庞大，他们在图书馆进行活动。学校当局处罚了在图书馆进行活动的学生，整个学校数万名学生，不光在学校图书馆，在整个学校校园里面游行集会，然后就把图书馆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行政大楼也占领了。这时候，

大学当局面对这种汹涌澎湃的学生造反感觉束手无策，校方只能求救于警察，他们召集警察到学校对付学生，警察就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来。这个时候，大学的教授就站在学校的教学大楼前面，挡住不让警察进到学校，警察就被迫和教师、学生谈判，谈判了很久都没有效果，最后警察还是决定强攻，大批的警察就进来，教授们重新站过来，警察又推回去，而且把学生们驱逐出去。

在那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间，有 700 多名学生被捕，100 多学生受伤。这是 1968 年春天发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

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也出现过造反的情况，也是在 1968 年的春天。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随着未来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征兵到越南去，一定要号召这些学生起来服兵役，学生中间有一个反战的运动；另外一个方面，和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学生非常不满意军方在学校活动。比方军方在哈佛大学开一些跟军事有关的课程，而且还要组织很多后备军官预备队的行动。军方这些行动遭到了大学团体的压制，学生不满意，爆发了越来越大的集会跟示威活动，军方就调动了大批警察到学校里，就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伤了很多，警察也有大量的人受伤。在这过后，双方僵持不下。到后来，学生方面没有支持下去。因为学生是这样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学生造反非常激烈，但是学校内部还是有一个民主程序，到底该做什么事情，大家要商量，商量不下来就要投票决定，最后学生要做一个决议。

所以他们在造反的时候，在民主之下，有一个照章办事的做法。在后来跟警察的冲突跟对峙中，学生运动到底要走到哪一步，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暴力。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僵持不下去的，学生也没有得到老师跟教授的支持，因为有的学生出现了暴力的倾向，老师和教授是不愿意这样的。后来这件事儿大家就遵守决议，哈佛大学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看出：美国 1968 年的造反活动，实际上受到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法国学生起来造反以后，美国的学生运动就（开始）到处出现。在 1968 年，受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美国大学里面大大小小的集会示威超过了 2000 次，有 300 所以上的大学都有发生学生造反的事件，到 1969 年达到高潮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两起学生造反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做“气象员”，为什么叫“气象员”？因为造反者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使没有气象员，我们也知道风要往哪边吹”，它的意义就是说实际上你别告诉我，我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学生运动里面最激进的一支，他们就把自己命名为“气象员”，他们把这个运动越来越往激进的方向推。他们鼓吹暴力，最后要制造炸药，袭击美国的警察局，或者是火烧警察局，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气象员”这个最激进的学生组织在一个大楼里面，自己制造炸弹，很多年轻的学生就失去了生命。这件事情，使激进的学生组织损失很多，你看他们自己把自己炸死了不少人，暴力活动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美国的学生也从来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美国的工人是非常反对学生运动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在中国也有体会，跟中国最对着干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限制贸易这一块最好。比方说他们（美国工人）觉得美国的资本家在中国投资，等于把工作机会给了中国人，而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也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美国的工人保守传统是非常强烈的，美国的学生那时候得不到工人支持，美国的工人阶层跟美国的政治社会之间有隔阂。但是不论怎么说，美国工人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自己制造炸药，炸死了自己，他们这种暴力行动——去袭击警察、去烧警察局，都没有人支持。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学生运动大概在 1970 年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一点上，跟法国的学生运动结果是殊途同归的，原因都是暴力性得不到大量的支持，而且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最后就消沉下去了。而美国的变化，意志消失以后，美国那些学生又出现 180 度大的转变，本来穿破破烂烂的牛仔裤、特别放荡的人，现在穿西装戴领带，该考试就考试，该拿学分就拿学分，该拿学位就拿学位，就出现这种情况，大选的时候该投票也出来投票，该上教堂的时候也上教堂了，又回归了他们的主流价值。美国人就把求职、把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把建立家庭放在自己首位，就是整个社会回归到了正常的秩序。

第三部分，中国 1968 年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就像今天有些报刊做的 1968 年一样，跟大家的初步印象是相反的，1968 年中国的青年学生跟西方学生的造反不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生活方

式。实际上，中国的 1968 年不是学生造反，而且是学生造反结束，还不光是这样，整个学生思想实际上还是在批判性地反思造成早两年的行为的思想。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学生说要造反，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中国学生造反应该是在 1966 年，而且这种造反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做的决议，是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 通知”以及“16 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议最后组织起来的。要说当时中国学生的造反以及给外国留下印象的话，最明显的造反高潮应该是 1966 年的 8 月份，那时候以北京为典型，叫做“红色恐怖的八月”。中国学生在 1966 年，以“红八月”或者“红色恐怖的八月”为代表的造反有两个特征，这是跟西方学生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特征叫做“血统论”，就是当初的学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当初的学生在 1966 年之前，早就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分成了三六九等，一部分学生叫做“红五类”，就是你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或者是工人；另外一部分叫做“黑五类”，这五类是黑色的，地富反坏右。但中间有一些数量的教师、律师或者医生，那时候叫做“麻五类”，就是既不红也不黑，但是你必须改造自己。

那时候学生里面流传着一副对联，支配着学校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红五类”出身的人由于父辈是革命的；另外一部分，是“黑五类”由于你家庭背景不好，由于你父母是反动派，你天生就是反动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界线。相当多的学生由于出身不是“红五类”，他是没有资格参加造反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中国造反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西方造反绝对不会问你爸爸是干吗的。你爸爸如果是个部长，那么你可以造反，而且袖标是很大的，如果你爸爸是处级干部的话，袖标小一点。那种等级制，那种中国封建社会那一套皇权制度下的东西，实际上完全是反着过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假造反，你父母的地位严格决定了你现在有多少造反的资格跟发言权。

第二个特点，1966 年，中国学生打出文化革命的旗号反对文化。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时中国的教师最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带队，带着自己全校的几千学生跑到山东曲阜去，挖孔夫子墓，然后就是北京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庙宇都被摧毁，图书馆的书全部被拿出来，说那些是资本主义的图书，直接拿到造纸厂化成纸浆。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打着文

化革命的旗号，其实完全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文化。这是中国的造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造反，我认为跟西方的学生造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中国学生还是有好的一面，虽然是完全盲目的个人崇拜，誓死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到 1968 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学生已经开始考虑文化革命到底对不对、文化革命是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最新的革命、是不是彻底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学生的主流在 1968 年跟西方学生刚好是相反的，他们的造反运动是方兴未艾，我们的造反运动已经是开始批判性的反思前几年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这里谈一个学理性的问题，一般我们熟悉的概念，西方学生也是这个观念，中国人也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把文化革命叫做“十年浩劫”或者“十年动乱”。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接近 10 年的，就是从 1966 年开始，一个标志是 1966 年 5 月 16 号，因为中共中央发表文件，把文化革命起点定在这一点。文化革命结束，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把“文革”派的人一网打尽，文化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从一般的定义，中国文化革命是 1966 年到 1976 年，我们叫做“十年文革”。但是西方的学者一般不采取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印象中就叫“三年文革”。西方一些学者写的重要的书标题就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为什么他们这么看？他们不把后面的看成是“文革”，他们把学生造反的结束、学生的退出叫做文化革命的结束。这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到底文化革命应该算是“十年文革”还是“三年文革”？我觉得各有优缺点。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多数还是照顾中国的思想倾向，经常提“十年文革”。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其实说是“三年文革”也还是有道理的。我现在也要讲个事情，为什么“三年文革”很有意思？实际上有大量的文献说明，1968 年时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比如说，1968 年的时候，报刊上就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 1967 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然在 1967 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应该说在短短的一年后，1968 年就是文化革命结束的一年。

另外一篇社论说：“随着全国包括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文化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说法也证明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到 1968 年 8 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召见了当初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大学的韩

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还有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五人，这就是五大学生领袖。毛泽东严厉地斥责他们，实际意思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别以为我们中央是支持学生造反的，你们从此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实际情况也是，毛泽东训斥了这五大学生领袖后，造反完全停止了，接着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中学，包括每个小学造反的革命秩序完全就没有了，军人跟工人，那时候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队，他们进出每个学校，恢复秩序，校长完全没有了。从外部力量、整个学校的权力都由工人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整个运动史已经完全结束了，到了 1968 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干脆发出一个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来一个动员，要让城里的干部和家长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农村去，就是不但让学生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把你移出人口密集的城市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革”实际上是三年，到了 1968 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说法是挺有道理的。

在我国，具体谈到 1968 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是上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1968 年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在 90 年代，1994 年、1995 年，为了纪念文化革命爆发 30 周年，当时我准备编一本书，题目叫《那一代人的回忆》，就想把我们青春时代的思想和行动做一番回顾跟反思，我就找朱学勤约稿，那篇稿子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题目叫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是跟朱学勤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是小学生，对这种造反现象非常钦佩、非常崇拜。他觉得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叱咤风云，干的事情都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甚至决定人类命运的事情，世界都是由这些年轻人决定的。当初是这样说的，他就非常羡慕，跟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也去干。后来他年龄大了，就观察那个现象。上海的名牌大学学生、中学生，而且都是当初在学校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家到了后期已经没有造反的余地了，这群人非常好学、非常愿意思考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也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响，有一大批人开始非常刻苦地看书、非常热烈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他就把这种人叫做“1968 年人”——就是中国的青年里面出现了一批民间思想家，他们完全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只是高中生、初中生，但是他们承担着一种责任，他们在认真地思考中国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朱学勤就受这个影响很多，这批人下乡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去，这批人看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最后他自己的思想已经超过这批人了。他现在在学术上成就也很大，在中国社会里面、现代话语里也做了很多事情。他就很怀念这批人，他说当初给我启蒙的这些人，那批曾经在 1966 年、1967 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后来革命造反的潮流退潮以后，又坐下来认认

真真地看书、认认真真地思考中国问题的这批人到哪儿去了？当初这批人教导了我，启蒙了我，最后我自己成就出来，这批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中国当代史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消失掉了？这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篇文章出来以后，确实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从此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个专有词汇——“68 年人”。“68 年人”这个概念是从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篇文章中来的，是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段跳不过去、不可忽略的前瞻，就是有一批中学生他们承担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中国问题，而且思考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最后这批人没有修成正果，莫名其妙，不知所终了。他发出这种感叹，引起了整个一代人，就像我这一代人的共鸣。

所以，现在在中国，“68 年人”这个概念不胫而走，大家特别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从这种意义上，我自己大概算是“68 年人”。朱学勤的这种观察是非常有意思的，朱学勤准确地看到：1968 年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思想跟 1968 年的西方青年学生是相反的。西方的学生造反处于方兴未艾的地步，中国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退潮了，他们在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我们对自己前几年的造反有另外一个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狂热支持的文化革命实现了一个深刻的反思，我们有一些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没有彻底地、甚至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摆脱某种影响，但是独立思考的萌芽已经起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一代人对于文化革命，包括类似于文化革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那么反感，实际上就是“68 年人”的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现在想跟你们提到几件事情，说明中国的造反实际上走向了自己的一个反面。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遇罗克，他写了《出身论》，我刚才讲了 1966 年中国所谓的造反高潮——“红八月”，他讲的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东西。敢于出来公开反抗的基本上就这一个人——遇罗克。他就公开提出，人天生是平等的，不能根据老子决定自己的一辈子前途。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能不能考上初中、初中能不能考上高中、都跟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后面在谋取职务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入党的时候、包括当初最光荣的事情——参军的时候，基本都是家庭决定这一切的。所以，我把这种东西叫做“血统论”。他就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那种思想的朝向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出身论》里面提出“人权”这个概念。我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有人在那种情况下

思想里有这种东西。但是你看他的文章，你能够看出来，他对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都是非常熟悉的，对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熟悉的。

在 1965 年，姚文元写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虽然一开始没发表，当然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发出以后，遇罗克就开始公开地批评姚文元，这真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不久之前的中国民间思想家。

1968 年 1 月 5 号，写了《出身论》、写了“赋予人权”的遇罗克被捕了，后来因为他的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反对当初文化革命那种特别残忍的专制主义的做法，他在 1976 年 3 月份被枪毙了，就是因为思想的原因，他的罪证呢，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的日记记述了他的思想。

同样在 1968 年，有个大学，现在叫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大学生叫王申酉，是一个家庭出身非常好非常红的人，但是他就没有好好利用这种社会给他提供的好处，他自己开始独立地思考。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他甚至坚持了很多年去看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后来觉得不单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中国大跃进也是错误的。他也是在 1968 年 1 月份被抓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探讨中国正常向现代化目标发展应该怎么做。他写了大量的东西。在 1968 年 1 月份被抓起来，而且是在 1977 年被枪毙。1977 年，这实际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

同样在 1968 年 1 月 6 号，湖南长沙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叫杨曦光(杨小凯)，他特别活泼，他在 1968 年 1 月 6 号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这篇文章惊动了中央，他也因为思想犯罪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但是杨曦光有一个好处，他被单独以思想犯罪关在监狱里，跟一大房间的几十个政治犯关在一起，因为政治犯是最有思想的，中国当初最杰出的人物，一帮大右派联合起来造反，那都是湖南长沙最高等学府来的，都是大学里面的，所以十年来，他在监狱里面等于上了好几个大学，把数学、历史、英语全学了，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最后大名鼎鼎，被说成是中国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人。这篇《中国向何处去》也就是在 1968 年 1 月 6 号发表的，他后来被全世界经济学家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确实非常了不起。

我猜想，朱学勤写“1968 年人”这个概念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上海有些中学生——当年的这些造反头领，后来毛主席一道密令把他们所有人赶下政治舞台，他们心有不甘。他们觉得毛泽东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觉得毛泽东革命的神圣使命，我们还要来完成。毛泽东把我们赶下去，是毛泽东战略上的退却，因为中国的革命迅速退却了，也把我们牺牲掉了，也对我们进行了处罚。但是他们觉得哪怕毛泽东处罚了我们，仍然要考虑天下。

当时是 1968 年，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备九大，九大就是巩固文化革命成果。他们在 1968 年的春天，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也就是当初文化革命时期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文章，题目叫做《一切为了九大》，就提出对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进行认真地分析，模仿毛泽东，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各方面进行思考。朱学勤最崇拜这一批人：虽然他们自己深情落泪，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但是他们认为文化革命政治运动的规律，都是需要搞清楚、要算帐的。这批人处在很困难的时期，仍然在考虑中国的前途跟世界的前途，所以他们写的题目叫《一切为了九大》。

这种事例非常多，同样在 1968 年，我感觉是中国造反运动结束了，但是有些省份也没有结束，宁夏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宁夏有一大批中学生，有一大批大学生，他们还可以搞运动，他们比国家形势要落后一些。但是他们感觉事情不对头了，（尽管）没有任何力量压迫他们走下政治舞台，他们自己自觉自动地退出了政治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自觉地按计划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还办了一个刊物，来探讨他们学习的成果。他们纯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叫做最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来批判文化革命。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背叛文化革命都不是想去批判文化革命，实际上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实是毛主席晚期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跟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是第一要素”这些观点完全相违反。所以，我们背叛文化革命，我觉得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在用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极左化的马克思主义。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初批判中国的话：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那种野蛮跟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想这话仍然是正确的。

宁夏这么做，但是他们所成立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后来）被破坏了，它当时有二三十个成员，其中的主要成员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有三个自杀，另外是判十几年的徒刑。1968 年，对中国来说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一点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年，1969 年，在江西赣州有一个叫李九莲的（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胡平专门写过她的事情），她就是在 1969 年思考自己当了造反派、自己搞学生造反到底对不对，是做了炮灰，还是真正做了革命的小将，为了神圣的事业，她是被整个文化大革命所欺骗、所利用，她把自己的这些反思写在日记里面，写在给男朋友的信里面，最后男朋友把这些信交给党组，最后这个李九莲就被抓起来，在 1977 年被枪毙，被枪毙的还不止她，还包括她的战友，还有些人跟她完全没有关系，出来打抱不平，认为李九莲没有错，结果就被枪毙了。

最后，这种事的反思达到最高的境界。1974 年年底，广州有三个年轻人，化名叫做“李一哲”，“李”就是李正天，“一”就是陈一阳，“哲”就是王希哲。他们以“李一哲”署名大字报，写了个《民主与法制》（《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大》），我认为这是当初中国青年的思考中，成就最高的，他们已经在思考中国实际上搞的是军事法西斯，他们把文化革命的本质看得那么清楚。他们提出了一整套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的思路），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跟民主法制连在一起，否则社会主义完全是假社会主义，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给他们平反了。所以这些事情确实能够充分证明 1968 年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我举了这么多例子，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 1968 年，青年学生的思想和革命行为跟西方学生甚至是有点相反的。那我们就会考虑，“1968 年人”，我们把这个中国概念套到西方那里去，中国跟西方的这种造反者，就是“1968 年人”，他们过了一代，过了 20 年以后，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对年轻时候的造反行为是怎么看的呢？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我后来在 80 年代中后期，得到一些机会去参加国外学术会议，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以我为例子，基本上是 40 岁上下，1966 年到 1968 年的造反者就是处在这个年龄。这个年龄，一些在学术上有上进的，比如像我，在 1962 年，大学停办了，但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就成了第一届大学生。因为我是 1977 年读大学，大学读了半年就跳级，就考了研究生。这一批人中，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上的中坚分子，我们就有机会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与这一点相应，西方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也是更愿意到国外去。因为我们耽误了 12 年，我们这种人是少之又少，坚持学习，最后到了 78 年、79 年还可以考研究生，到了 80 年代还可以出国，比方我到英国去了，而且那时候，是最早当上副教授的。随着年龄的这种新陈代谢，我们已经是中国学术上、文化上的第一届人了。我们是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被推出来的。后来发现，美国或者欧洲

国家，他们也是 40 岁上下的那批骨干，他们的地位就比我们高一些，他们担任大学学院的院长或者系主任，或者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后来就发现，由于年龄相仿，大家特别谈得来，但是谈话中间，最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最后发现，这种对立，刚好是因为我们有相仿的经历，有 1968 年前后造反的经历。

这样的对立表现在什么地方？一个是我们都批判自己所在的社会，我们都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对方的。当时 80 年代的中国是全力以赴地学西方，中国的基础路线，都是学习西方最好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整个中国的倾向，不要说别的，就是那些最左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跟西方人打交道，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好，我们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好，都是在批判自己所在国家的制度，这是后来感觉最明显的特点。后来感觉很奇怪，你西方人怎么老说西方不好？你们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老说社会主义不好呢？我们就要解释社会主义不好指的是“四人帮”搞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发现对自己的经历，我们中国人出去就是吃过亏，西方人吃过亏也是肯定的，这是一样的，但是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谈到 1968 年造反的时候，两者是尖锐对立的。后来能够看出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所谓中国的“68 年人”，有我们自己一系列的亲身遭遇，我们看到文化革命有十年，我们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对自己的造反生涯，对于我们曾经深深眷顾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这样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简单地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文化革命，这些人最开始被毛泽东、被文化革命小组统称为“天兵天将”，江青的讲话是“你们完全是小太阳”。文化革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善始善终的，每一个组织都曾经红极一时，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把你说成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很残忍、很黑暗的东西，实用主义的人多得不得了，每一个组织最终都是犯错误的组织。

1968 年，毛泽东有一句话，这样一句话对我们这一代人太意味深长了：现在是轮到你们犯错误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革命时期，我说谁犯错误就是谁犯错误，我建议你们打倒他们，但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这句话包含着非常的冷酷和残忍，就为了政治需要，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善始善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一个感觉，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是被利用了，当了炮灰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第二个原因，1968 年，我们这一群政治上曾经有需要的人被全部赶到乡下去了，在那里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在书本上接受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是自己的优越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后来我们在乡下看到农民的文化之落后、生活水平之落后是无与伦比的。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对文化革命开始怀疑了以后，我仍在相信以前那种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最优越、最好的？

第三个阶段开始，林彪事件出现了，文化革命闹了大半天，无非是青年阶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借中国第一号领导人打倒第二号领导人，输了由林彪出面解决。林彪是在内蒙古意外死掉的，这件事情使任何一个人还想保留我们以前那种政治信念也绝对做不到了，这种嘲弄，现在你很难想象，当年那种思想是捍卫毛主席，突然，在乡下，大家集中起来传达中央的文件，说林彪是叛徒。我们文化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的路线无非是想把毛泽东思想推向最高的革命境界，怎么会搞到这一步？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是一步一步蜕变的，已经蜕变到跟文化大革命有点相反的地步。

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的造反没有一个组织参加，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社会不造反仍然是个高材生、仍然是个优秀的学生、仍然能够拿到学位、仍然可以在大学里面从事高尚的职业，当个教授、当个系主任。所以，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处罚，他们从来没有由于他们的造反去反思自己的，不像我们，我们有一种当政治炮灰跟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深刻地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对历史的进步起什么作用。西方跟我们对等的“1968 年人”从来没有想这些问题，由于没有想这些问题，他们对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自己生命价值处在最高峰的那几年，他们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一谈起来就是缅怀的态度，所以刚好跟我们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种对比不单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种对比在中国还有。后来中国在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不断地派人到海外出国留学，大部分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也有极少部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因为西方这些“68 年人”早就当了系主任、当了名牌教授，中国这些留学生就在他们的名下学习，他们把自己 1968 年的思想提升成理论，他们有一整套西方理论灌输给中国人。所以中国的年轻一代学生，当他们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他们就跟他们老师一样，跟中国有剧烈的冲突，因为他们是支持文化革命的，通过老师他们学到的是文化革命是追求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这种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现在美国鼓吹这种东西，（受到这种影响，）现在清华大学也鼓吹文化革命、68 年这些

事我们一定要继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里面有非常合理的因素，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抛弃，是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还有对我们的反思，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文化革命？”后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面，西方“68 年人”给他们灌输的观念跟我们中国“68 年人”的判断、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误会。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还是持比较批判性的态度。但我认为 68 年给当代的社会生活留下的社会遗产，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东西，这些正面的东西也要分几方面来说。我们先说西方，西方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不是靠大破大立来激烈地改变社会，它有一整套民主法治的东西，对暴力是特别排斥的，它能容纳任何批判性的意见，在言论自由上，保障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西方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不像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或者对这个社会进行猛烈的冲击。西方的统治阶级跟西方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从青年学生造反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相当尊重青年人：为什么会这么不满，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暴力的行为来反抗现状？既包括大学教育制度、也包括社会制度，他们做了很多调整。从法国蓬皮杜那里就能够看出来，美国也可以看出来，学生造反的时候美国一批法案就出来了，在越南也开始裁军，对黑人的歧视开始注意，变得越来越好。

学生的造反虽然在表面上没有成功，没有学生宣告自己成功了，但是学生的造反给了整个社会一个提醒、给了整个社会一个警示：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社会马上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使得社会在良性循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这是在西方 68 年遗产正面的方面。

而在中国这方面，像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是极度地造反，处于过度的迷信中，那种盲目、那种无知、那种愚昧、那种烧图书馆、砸教堂，乱七八糟的坏事都干尽了。但是经过反思以后，实际上，对以前那种极左的东西，对那种反人类文明的、野蛮的东西、反血统的东西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有一个特点，甚至在“四人帮”推翻之前，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些别的看法。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比如北京大学，有个年轻人，他被下放到乡下去，最后在“四人帮”结束很久之前就提出支持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整个这代中国人，刚好由于反思了文化革命，思想比较彻底地改变，这一代人后来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包括在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于“四人帮”表示不满的大抗议、大示威中，对“四人帮”最强烈的抗议，一定是来自“1968 年人”，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经过反思才有的这样一个立场。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1968 年以后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还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比如大家独立思考的意识。西方 68 年的独立意识，就是不轻而易举地认可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批判性的反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 68 年跟西方的 1968 年一样，要坚持一点，就像刚才讲到的，中国文化革命还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点最明显，像王朔、姜文他们，他们鼓吹的是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的父辈都是部队大院的高级干部，军队干部是文化革命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像后来的工厂，一个小小的排长可以担保整个工厂。在他们心目中，文化革命时，老师也被打倒了，也不上课了，也不考试了，种种束缚制度都没有了。像姜文、王朔他们感到文化革命是鸟笼打开了，我们是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写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东西，所以就把十年浩劫的痛苦给抹杀掉了。

所以，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七年了，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记不住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把文革说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定是我说的这种不好的观点。我们始终要把这一点说清楚，文化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你们说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你们是一小搓很特别的人，你们的感受实际上跟中国老革命、老干部、所有知识分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们现在要跟后一代人讲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故事，实际上对历史会有负面的作用。所以，“68 年人”还要面对这么一个负面的影响。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打倒走资派”的概念，毛泽东之所以把亿万人民能够动员起来，支持他这种荒谬的想法，开始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际上他是提出了社会公众平等的口号，提出了打倒特权的口号，但是这种口号纯粹是为了动员人民群众。随着中国越来越不公正，很多人开始怀念文化革命口号性的东西，就是社会公正，要平等，特别是文化革命毛泽东打倒走资派，实际上是很荒谬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荒谬。因为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以后，如果说以前的干部是走资派，是个很荒谬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干部都是走资派？毛泽东的话荒谬到这种地步，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走资本主义，不知道路线在什么地方，敌人就在共产党里面，这是很荒谬。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说，文化革命所有荒谬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对现在的反贪污、反腐败感到无能为力、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会怀念文化革命，他们会怀念文化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群众可以随意地见到官员和领导。

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革命是一个虚假的概念，走资派的概念是非常不科学的概念。现在个人要提倡社会公正、个人要提倡平等、个人要减少政权专制，但是绝对不是让文化革命（来实现）。在新的条件下，哪怕有这些特权在成长，有大量的贪污腐败，我们必须在民主与法，尤其在法制的基础上施行。如果你用大字报、游行这种自由，可以任意地攻击领导干部的话，干部把你打成反革命也是有的。所谓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实际上吃亏的仍然是老百姓。现在很多地方工人下岗，他们再就业的时候，都是走文化革命的那种标准，都是一些陈旧的观念，因为他不知道更新的观念，不知道用一种更法制的手段来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遗产，这种遗产是一种负面的遗产：一种把文化革命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种认为中国要实现公正的社会就要走反资本主义道路的思路。我认为，这（理性继承 1968 年的遗产）是中国未来任重而道远地要去做的事情。

我就讲这么多，同学们有什么不清楚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探讨。

提问：徐老师，您好！我的问题可能跟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都知道您在 80 年代就已经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专家了，是什么促使您在 90 年代走向政治哲学？

徐友渔：促使自己转变的是我们的社会发生着比较急剧的转型，这个转型中间出现的问题更重要，使得我不能再继续待在象牙塔里面。我觉得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公正性的问题，而社会公正问题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我在研究的中间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哲学基本理念可以用到中国来，但是我不可能是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地付诸行动，我还是在思想层面做事情。我转型做政治，纯粹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种种问题刺激着我，使我不能并且难以进行以前纯粹抽象的研究。

你们可能没这种体会，放弃以前的研究成果，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感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形势最终还是驱使我去做这样的决定。现在对政治这一块的了解，使我对中国现在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比如什么叫宪政、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公正，在中国具体条件应该怎样实现，包括大背景怎么公正、怎么平等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我跟分析学告别是非常痛苦的，现在看起来也是不痛苦的，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负了一点责任。

提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您如何评价杨小凯的文章和“7•20 事件”？

徐友渔：哪一年的？

提问：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否认为像您、还有胡锦论、还有张鹰基，你们当时都是成都的，你们三个人也能算是一个组织么？

徐友渔：那篇文章说的是什么？

提问：那篇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非常慢，他就把 68 年那些人作为那次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友渔：你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提到这里我先给大家做一点解释，也许你知道了很多，别的同学不知道。

杨小凯是北京大学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也是研究文化革命的，跟我是好朋友，他研究得非常厉害。他是研究文化革命的思潮的，所以他的成果很有意思，可能今年会在香港出一本书。

是这样，一般人认为杨小凯那篇文章跟“7·20 事件”有关系，但是据我的研究没关系。“7·20 事件”是一个什么事件呢？应该说，全国都是造反，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保守派都被毛泽东打成反动组织。“7·20 事件”可以说是文化革命出现的一股力量，毛泽东派的中央文革的钦差大使到武汉视察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批评保守派，结果就被抓起来了。当初这件事儿非常厉害，后来武汉发生了兵变。在中国，毛泽东威信比天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派的两个最大的心腹到那里去，结果被军队抓起来了，全市进行大游行，而且是持枪的游行，就像“文革”派举行的非常大的游行。文化革命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一面，王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其实那时候毛泽东也在武汉。毛泽东那时候已经感到了威胁。正要发生兵变，毛泽东穿着睡衣就跑走了，慌乱地就跑走了。

文化革命中这些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最惊心动魄的大概就是“7·20 事件”，“7·20 事件”最后的结局就是，毛泽东宣布林彪“7·20 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就处理武汉军队（当时支持武汉军队的一大批群众有上百万人，那个组织叫做“百万雄师”），而且马上宣布这是反革命组织，加以摧毁。

我的文章在思潮上，很间接地跟它有关系，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另外一方面，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从文化革命中，青年学生自己思考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西方学者最早发现，在全世界流传很广。它也是研究文化革命中间青年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但是就我个人的评价，杨小凯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他的这篇文章是研究文化革命独立思考里面最差的文章，为什么这么说？他认为文化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他认为周恩来是中国红色资本家最大的代表，文化革命为什么没有结束？只要不打倒周恩来，文化革命就不可能结束，中国所有的坏事、后来的事情都应该算到周恩来头上。他认为最后处罚他、把他打成反革命，周恩来是起作用的。

这种思潮，实际上比毛泽东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潮还要更严厉、还要更极端，他已经极端到“文革”派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忍受了。在这个领域上，是沿着那条路在走，但是整个理论框架是以文化革命理论为框架的，这篇文章跟在他之前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法相比。但是文化革命的独立思想最深刻的应该是“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把整个文化革命称为一个军事法西斯的专制。文化革命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文化革命讲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西打的是最高的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最腐朽、最没落的东西。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有相当多独立思考的这种意外思潮，包括刚才提到的《一切为了九大》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问题，文化革命像成都中学生里面，比较有影响的可能是我们几个（指问题中所指的三个人），这后来跟美国学生造反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考虑，文化革命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地方：我们或许不是亲历者，但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怎么看，大家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兴趣也不在这方面，它已经在西方主流的学术体系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他可能也不会讲这个东西。所以文化到底还是跟生活非常不一样的。

提问：徐老师，您好！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缺少学生运动了？“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灵魂，现在已经没有大起大落的学生运动了。这是因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使我们越来越理性呢，还是现在的压力使我们根本就没有学生运动了。您作为一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您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好的事情还是一种不好的事情？



徐友渔：我认为一个经常出现学生运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个不正常可能是社会制度的不好，或者是一个民族跟一个国家处在外敌入侵、风雨飘摇的时代，所以到“五四”才会出现那样的学生运动。站在意识形态的传统（观点来看），一般都是给出正面的评价。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给一个正面评价，尤其是五四青年运动，它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反对卖国，这方面也是很正面的。

但是，我讲一个自己的体会。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什么呢，是火烧赵家楼，把那些签订巴黎协议的人抓起来暴打一顿。因为我是研究哲学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读杜威的日记，英文本的，那时候很有趣，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是杜威，一个是罗素，当时都带学生了，而且都是带大学一年级以上。杜威日记里面所写的让我大吃一惊，学生运动天经地义，特别好，特别爱国或者特别正义。杜威在美国也是一个左派的进步人士，他写到，你说签协议的人卖国，你有什么证据？不管他卖不卖国，你怎么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房子烧了？这完全是破坏法律的。我当时非常震惊，接受不了，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进步左派，怎么反对中国标准的最典型的“五四”运动的学生做法？我并不接受杜威的这个看法，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回味，我觉得并不意外，杜威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是在一个民主跟法制的社会里面，他做这个判断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判断一个学生运动，我们是给它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评价时，要看我们社会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当处在一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阶段，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示威游行的行为，可能我们会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同时，我们是在一种革命的激进主义的传统里面这么看的，我们对我们这么看本身也应该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

最后，我还是想通了，杜威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后来我还稍微倾向于接受杜威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会少有学生运动。在这种意义上，这要看怎么评价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的话，我不希望有学生运动。所以，就像我今天讲到的，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权利，我们应该在投票箱里表达，但是这个投票箱也要有一个前提，人要有投票选举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从这种意义上，我站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立场上，我也不认为中国社会、北京这边就完全排除掉了，当一个社会需要我们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这方面最著名的是 100 多年前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它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也不是中国那种国破家亡

（的社会）。当它出现一种极不正义事件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也应该站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我把学生运动是当成人民倍受煎熬忍无可忍的一种社会表达，不能轻而易举动辄就有学生运动，学生运动频繁的国度一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以我这个回答没有一定之说，要视情况而定。

提问：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这篇文章中提到，实际上，学生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五四”。“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方面是越来越激进，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没有认同感。不知道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友渔：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余英时是我极其佩服的一个学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太赞成他的观点。余英时表达了这个观点，表达了杜威的观点。在年轻的一代，朱学勤这一帮人的观点都非常明显，他觉得文化革命完全是跟“五四”运动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思潮。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有两派意见。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余英时他犯了一个错误，文化革命表面上叫做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宫廷政治、是搞阴谋诡计的，你看林彪事件，阴谋诡计搞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看表面文章，看舆论，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这些东西，你会把它看成是文化运动，看成文化运动当然是很激进的，批孔老二，要批林批孔。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把文化运动跟“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五四”时，你看胡适、陈独秀、鲁迅不是都是否定传统吗？要拼命批孔，又要否定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极其表面的现象。

我觉得我们看待中国问题不应该这么看待，文化革命纯粹是一个最尖锐的政治问题。林彪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想恢复一个比较良好的秩序，实际上，通过批林彪是批判的文化革命，或者是力所能及地扭转文化革命那种破坏性的东西，他把林彪定义成是极左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文化革命或者是毛泽东那套东西确实是极左的东西。周恩来是想改正文化革命的错误，但是毛泽东是伟大领袖，那种洞察秋毫，那种敏锐性，一下子就知道周恩来的意思，就把林彪从批极左改成批极右，说林彪表面上是左，实际上是极右，右到什么地步？右到要批，为什么要批？批孔夫子。因为周恩来既不能向彭德怀那么刚烈，就是公然对抗，最后就是自取灭亡，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是太愿意为虎作伥、专门去干那种坏

事。所以，他呢，就是一方面要跟毛，对文化革命亦步亦趋的，毛泽东说什么他干什么，一方面他又在遇到这种机会的时候，又想调整文化革命那种左的东西，力所能及地纠正错误。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甩也甩不掉，对他厌烦到了极点。当初文化革命中，所有人，从毛泽东到江青，就给周恩来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拨斤算两，专门搞挑拨折中。就把他跟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联系在一起；后来又发现周恩来还有点野心，靠批林彪的极左来纠正错误。

实际上批林、批孔是批周，毛泽东自己知道，实际上是批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批，所谓的批孔夫子，真正批孔夫子的文化上要进行革命的意识，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要打倒周恩来。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阴谋，我们被他的口号所迷惑。文化革命正面是斗争，每一件事儿，说的和做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说文化革命和“五四”是一回事，但“五四”是一个启蒙运动，解决的科学理性；而文化大革命讲的是毛主席的话一顶一万句，是一个极端的现代个人迷信，跟“五四”精神是完全相反的。

像我研究文化革命，我是一个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我知道，必须在政治领域（深入研究）。而西方有些学者或者西方研究者，一研究革命就跟孔夫子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研究意义上是有意思的，但是把文化革命看成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把批林批孔真正看成是要批孔夫子，打倒孔家店，完全是一个表面上的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东西。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恩来，在这种意义上，类似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把文化革命当成是“五四”精神的延续。

我认为，文化革命讲的那种蒙昧主义，反剥削、反民主，跟“五四”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反对把文化革命当成是发源于“五四”新文化或者是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东西，对此我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提问：刚刚您谈到，假如咱们抛开文化大革命，我们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间的背景？我们今天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重新建构，但是我们可以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是个口号，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反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如何去理解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意识上的民主和平等？

徐友渔：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写一本专著都回答不了。我就简单地回答一下。首先回答一点，为什么现在中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了？为什么现在国学会热起来？我自认为比较正确、比较中肯的观点，现在中国急剧地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无

论古今中外，在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或者物质生活的提高，他的精神上感到极大的反差和失落，越是现代化越是要追溯传统。这基本上是人类天性的诚恳。大家感到另外一个纬度形成真空，大家必须要扳过来。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我对现在大家重视传统是持一个正面肯定的态度，原因就是在这里。实际上在 1949 年以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批判性地蹂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荡然无存的。我们可以见到很多例子，宋楚瑜到清华大学去访问的时候，清华大学送给他一幅字画，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人，他念不下来，这种处境很遗憾，当时是现场直播，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很糟糕的。像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跟台湾打交道，真是心亏的，我们连中国文质彬彬的信都写不来，那种城府、那种措词，接到邀请信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台湾政治家过来，你看出来，对传统文化熟悉的程度，水平高低的差异到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1949 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大的破坏，对现在我们社会逐渐恢复比较正常的秩序以后，必须得对以前粗暴的破坏去给它一点点补上。这个意义上我是用一个同情的态度来理解现代文化。

这个问题要提这么提，中国现在的目标应该是现代化，或者叫做宪政民主、或者叫做自由民主、或者市场经济的基础的宪政民主的国家，这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共识。这种问题的出现，现代民主或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些理念无论是个人权利或者个人理念，实际上是从西方来的，甚至跟西方的基督教关系非常非常大，如果你从学理上来研究的话。中国是一个有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此丰富文化传统的一个国家，当我们建立一个未来的现代化国家的时候，我想在做这种正确安排以外，这种制度安排背后需不需要有文化的东西作为支撑？假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支撑的话，这个文化资源是不是要完全从西方来，我们必须从文化上重起炉灶，把西方的基本文化理念、思想理念全部拿过来，也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从内生到外来。我们再安排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文化支撑，就制度谈制度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东西要从什么地方来？一种答案，就是完全从西方来，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就是一种最极端的看法，这个看法显而易见，是行不通的，我也不赞成，不可能中国 13 亿人都变成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实现）自由民主或者宪政民主。中国既然不可能 13 亿全变成基督徒，文化不可能变成基督文化，那么像现在的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

另外，我们制度的安排文化资源一定要是本土性的，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文化太丰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之间找到一个接口，找到一个对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当代所有新儒家都是这样一个思路，中国（重构）的文化传统必须有利于现代化目标，使这个现代化能够结合成一个整体，不光是制度学西方，文化也是中国的，这两个东西应该是整体的，制度化资源和思想资源的支撑。在这种意义上，新儒家的做法就是，我试图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为主的宪政民主提供什么东西？所以新儒家拼命地在孔孟之道里面找到民主自由的东西，能不能找到？可以说勉为其难。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讲，实际上有点曲解，这东西也未见得是民主和自由的东西。

所以说复杂在哪里呢，我现在要谈我自己的一点前期的观点，这种新儒家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制度安排需要我们有文化资源，但是如果不曲解孔孟之道的话，你很难建设一个中国现代政治民主国家需要的东西。现在不光是新儒家，包括现在中国一批最活跃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人，他们都讲过这件事儿，他们就觉得重起炉灶是不可能的，我彻底要传统、我就去拥抱一个西方宪政民主，这是做不到的，还要再从这个角度去找。找来找去，像前面新儒家，找来的东西大家不服气，你说这些话就是民主自由，以此来开辟中国的宪政民主，这些东西就很难做到。

如果要说复杂一点，还有几条路子。一条路子就是这么来看待中国传统，余英时就说得很好，他甚至可以说是酷爱中国文化，他是一个中国血统的政治学者。他非常冷静、清醒得看到，现在还要从孔孟之道里面找到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做制度资源吗？这是妄想的，根本做不到，300 年来，几代新儒家都没有做到，儒家思想在未来的现代社会中间起到非常重要和正面的作用，（但是也）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间、在日常人文理念、在处理亲情伦理关系、在处理同事关系中起到这种作用。

这方面的例子最雄辩的就是台湾，台湾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但它的文化基础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台湾的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它的压力，这个现在我们没办法对它分析。但是至少有一点，台湾别的不说，孔孟思想这一套是悟出来了。我非常赞成余英时的观点：中国文化传统是有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只能在个人伦理、日常伦理方面起作用。

有一种错误，是朱学勤或者是秦晖提出来的：制度安排就是制度安排，我在做中国未来制度安排的时候不考虑文化的问题，考虑文化的问题就是文化决定论，好像中国的文化来决定中国未来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谈制度安排，不谈文化。这是一种错误，当然从学理上不能这么说。

还有一种错误，是有些人提出来的这里面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第一次演讲，他提出一点，他说："这种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的制度安排需要一个国家传统的东西。"他特别反对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有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来支撑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全球化的事实，我们从全球化的事实、这种经验的事实里面就能够得出我们政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当代的活生生的生活里面能找到。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观点都各有各的道理，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偏好，但是不值得介绍。就是这种思路，我觉得我这种思路观察还是很深刻的，你们可以参考这几种思路去看文件或者发展自己的考虑。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大学论坛第 10 期文稿。原文链接：http://www.zhuanxing.cn/html/forum/151.html）。

9-9 周穗明：西方新社会运动与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纪念新社会运动 40 年



“中国因素对西方 1968 年革命的影响是单向的，不是双向互动的。文革时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造反的中国红卫兵并不了解遥远的西方发生的事情。东西方两地造反者表面上的一次伟大的共谋，实际上是以中国因素对西方的单向影响的形式实现的。”

经历战后 20 年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之后，西方战后一代青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动了一场非传统的反叛运动，由此揭开了后 40 年新社会运动发展的序幕。同期，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青年造反浪潮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兴起，彼此交汇，极大地改变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景观。这个年代的思想遗产今天在西方被称之为“60 年代精神”。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 60 年代东西方同时发生的革命或疑似革命？西方新社会运动与中国 60 年代运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本文以此为思考线索，试图分析中国因素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解释两场运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透视新社会运动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一、历史观察：新社会运动兴起中的中国因素

首先，让我们重返 60 年代，回顾 1966－1968 年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表“五 一六通知”，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从 1966 年 8 月 18 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此后，学生“大串联”席卷全中国，“红卫兵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1966 年 5 月 22 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行反战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美国佬滚出越南”，并发生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峙。游行结束时，马尔库塞发表了长篇讲话，分析美国的遏止战略，重点介绍了美国的反抗运动，尤其是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1967 年 1 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格瓦拉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学生造反运动。意大利的校园激进分子从反抗传统的大学体制发展到挑战意大利国家体制，使运动在 1967 年 11 月蔓延到整个意大利，1968 年 3 月激化为罗马的街头械斗。

1967 年 10 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反战大示威。同时，有 35000 多名青年冲击美国国防部，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8 年 4 月 4 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 金被害，由此将美国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激发了新一代人与现行体制的强烈冲突。

1968 年 5 月，巴黎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及破坏性活动。持续一个月、声势浩大的“五月风暴”震撼世界，标志西方青年反叛运动的顶点。

20 世纪的 60 年代，整个世界弥漫着一种解放和革命的气息。东西方的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似乎共同构成了革命的某种形象符号。勿庸置疑，中国的 60 年代事件确实成为西方革命洪流的启动因素之一。

从现实看，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成为西方青年仿效的直接样板。红卫兵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砸碎旧世界”的激烈行为，以及他们营造的红袖章、“红宝书”和中国城市的“红海洋”等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景象，极大地激发了西方青年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幻想，引起了摹仿性冲动，以至于当时的法国报刊惊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

从精神动力看，毛泽东成为一代西方青年的崇拜偶像。他彻底批判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红旗落地”的资本主义复辟，要求消灭（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别，否定旧的教育制度和一切官僚体系；他提出“第三世界”理论，倡导组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号召实现世

界革命。因此，他在当时与马克思、马尔库塞并列“三 M”（Mao, Marx, Marcus），成为西方造反青年的思想引擎。

事实上，东西方革命在形式上共振激荡，在内容上则共同表现为对稳定秩序和现行体制的反感和抗议。这种反权威、反体制的一致性具体包括：抗议传统的教育制度；反对官僚化的现行体制；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拒绝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或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造反旗帜，等等。应当指出，这些抗议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反精英主义、反知识主义、反文化主义的气息，当时的东西方青年都采取了一种彻底摒弃一切传统的文化反叛姿态。

对新社会运动崛起的中国因素的上述考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中国文化革命客观上影响了西方新社会运动。其反资本主义的实践和激进批判激发了西方青年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并为西方 1968 年革命的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革命样板。

其二，中国因素对西方 1968 年革命的影响是单向的，不是双向互动的。文革时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造反的中国红卫兵并不了解遥远的西方发生的事情。东西方两地造反者表面上的一次伟大的共谋，实际上是以中国因素对西方的单向影响的形式实现的。

二．理论反思：新社会运动与中国 60 年代运动之间的关系

然而，60 年代东西方的革命果真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西方 1968 年革命与中国文化革命是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

西方新社会运动是 1960 年代新出现的一种异质于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新的社会运动形式。新社会运动之“新”，在于它反映了西方战后繁荣期行将结束时新一代中间阶层的不满，是一代有新价值观的新社会主体对战后新出现的社会矛盾采取的新形式的文化抗议和反叛运动。

首先，新社会运动产生的内在原因有其独特性，反映了战后西方新的社会矛盾和新冲突。在历史上，资本的无情掠夺造成的巨大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贫穷的积累，是社会主义工人

运动争取经济政治解放的内在诱因。西方战后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速成长一方面解决了社会的物质匮缺，另一方面也把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对人性的压制、对环境的破坏推向了临界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伴随着人性异化和环境危机。这一现代化的内在悖论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矛盾，直接引发了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本身弊端及其现代性基础的痛苦思考。新社会运动是这种新矛盾、新危机引发的新冲突、新抗议。

其次，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战后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二战后西方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阶级冲突的弱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尤其是物质生活富裕和教育程度提高这两个基本因素，孕育出一个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的新中间阶级。因而，较之传统工人运动而言，新社会运动的成员由相当散漫的新中间阶级各社会阶层构成，如青年、学生、绿党、和平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同性恋者或专业人员等等，也包括部分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反体制人士。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人，新社会运动主要体现了这些人的新的不满和新的诉求。

第三，新社会运动具有新的价值取向和斗争目标。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以劳动解放为目标的、组织化的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关怀重点、抗议主题、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一方面，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有非常突出的个人主义倾向，崇尚个性解放而不是改造社会。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崇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已经从上一代对消费、金钱、人身安全等物质价值的单一追求，转向关心“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等“后物质价值”，质疑现存秩序的合理性。新社会运动关注的环境、生态、核威胁和性别压抑等后物质主义议题，表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两种工业主义和两种官僚体制的双重失望，反映了西方社会在整体文化层面的新型冲突。

第四，新社会运动呈现出新的运动形式和特点。与传统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的集体组织形式不同，新社会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阶级归属，它们是非阶级化和去中心化的。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往往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等引起西方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表达各种不满和抗争。因此，新社会运动有多种分散的形式，如学生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等等。[1]一般说来，生态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五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2]

由此看来，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特定不满和独特的组织形式，明显带有战后政治发展的新特点，体现了战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英国学者劳伦斯·威尔德（Lawrence Wilde）称它“既是由经济和政治合理化引起的新抱怨，也是富裕社会正在上升的期望和正在变化的价值选择”。[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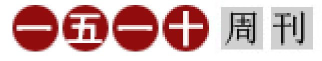
然而，比较而言，中国文化革命不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内在需要的体现，而是领袖个人意志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中国后发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次人为的断裂和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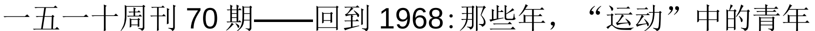
在政治上，与西方 1968 革命不同，中国文化革命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自发运动，而是自上而下的、由少数政治家操纵的运动。表面上，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具有反官僚主义反权威的外观，甚至被一些人称之具有巴黎公社的群众首创精神，但在事实上，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政治权力的掌控之中，许多行动是由少数政治家直接授意的。如果说巴黎学生的反叛是不满情绪的自发渲泄，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则是上层的人工设计。

在价值理念上，与西方 1968 运动中表现的新的价值取向和斗争目标不同，中国文化革命没有表现出任何新的价值理念，相反是对斯大林模式缺陷的全面强化。文化革命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革命、最新颖的形式下，集中展示了最极端的斯大林模式的权力形态和意识形态，同时带有中国传统的封建特征。狂热的个人崇拜、无休止的阶级斗争、高度集中的政治意志、压制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使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民（乃至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缺乏公民权利，缺乏思想空间。甚至，禁欲主义被等同于革命觉悟，全国人民在生活中只穿绿军装和蓝制服。这种价值取向不体现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是反资本主义（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失败的“革命”尝试。它抗拒历史潮流，违反人民意愿，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国家经济崩溃，人民生活贫穷，文化传统破坏，道德水平下降，等等。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后果延续至今，难以彻底抚平。

尽管西方 1968 运动由于主客观原因（越南撤军、阿波罗登月、70 年代经济衰退、右翼持政和民意的保守主义转向，以及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反思等）落潮了，但是它的内在根据和社会基础、它所创造的新运动形式和新价值观依然存在，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反核、反战和生态运动中、在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反全球化的公民抗议运动和反伊战运动中





获得了新发展。新社会运动今天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最有活力和最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反，由于中国朝野上下形成了否定文革的高度政治共识，反文化的文化革命在中国没有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成果在实践上对文化革命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人们坚信，文化革命对于中国不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相反，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 1968 革命和中国文化革命不是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实质联系的一场革命，而是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基本性质不同甚至相悖的两个运动。诚如黄仁宇分析中国与西方制度的不同特点时所说的，二者是“飞禽”与“走兽”之间的区别。东西方的 60 年代运动具有根本区别的社会基础，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各自不同的特点、目标和理想追求。它们在 60 年代的相遇显然具有某种偶然性。

然而，长期以来，东西方的左翼对彼此运动的性质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在许多西方左翼看来，文革是理想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官僚主义的革命运动。没有前现代经历的西方青年难以理解中国文革的虚幻性。他们错把文化革命的超阶段的极左理念解读为摆脱物质丰裕和精神空虚之间矛盾的解毒药方，错把前现代的乌托邦当成了一场共产主义的新实践，错把落日的余晖美化成了新生的朝阳。而在中国人眼中，新社会运动不过是西方工人阶级打倒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继续。当时没有现代化经历的中国青年也看不懂西方战后一代人对现代性危机的怀疑和苦闷，对西方青年 1968 年造反的实质根本无从理解，错把西方学生的文化反叛误读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当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人们被误导认为所有的物质文明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错把封建禁欲主义的“穷过渡”当成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这种双向的误读是时代和主题的错位，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因此，中国文化革命和西方 1968 革命两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严格地说，西方 1968 年运动具备文化反叛的客观条件，是一场必然发生的革命；而中国的文化革命则不具备客观前提，是一场偶然的、人为建构的伪革命。

三．现实思考：新社会运动与当代中国

从 1980 年代初以来，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中国人从中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新社会运动的进步理念（这一次与 60 年代不同，是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理论对中国单向地发生影响）。1990 年代以后，西方两种社会运动理论即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美国



的资源动员理论也开始为人熟知，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根源和性质的思考。世纪之交，新社会运动的当代新形式——反全球化运动第一次共时性地得到东西方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共同体验。尤其是经历了近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的历史境遇、社会基础和价值诉求已经发生巨变，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也已开始显现，中国开始面对西方 60 年代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客观社会境遇。因此，对西方以 1968 年革命为代表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反思已经具有某种现实意义。新社会运动从文化理念、公共政策和社会建设等层面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及历史警示。

其一，从社会层面看，新社会运动折射了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了新社会主体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加强社会建设，扩张现代化的公民基础，实现新的社会整合。

从某种程度上，1968 年运动是战后 20 年西方积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它成为战后新社会阶层展示其政治能量和社会诉求的舞台。在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中国社会迅速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型。社会结构的这一深刻变动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社会变化的多元现实下，新的社会主体不断出现，社会成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高发期，改革以来积累的各种新旧社会矛盾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1968 年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漠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及其诉求，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只有正视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充分尊重社会新主体出现和新现实，才有可能适应非传统的多元社会主体的诉求，以相应的社会政策化解社会冲突；才有可能全面改善公共政策体系，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

其二，从文化层面看，新社会运动代表了战后新社会主体的新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新的文化诉求，主观上需要拓展价值视野，扩大文化包容，促进参与平等。战后西方的社会危机和抗议运动，本质上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发出的多元文化权力抗争。1968 年运动的文化抗议性质充分说明，实现新的社会整合需要新的文化价值理念。旧思维不可能解决新矛盾。在后 1968 年时期，新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在西方已经逐渐成为加强社会团结、促进公共政策改革的文化价值基础。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多元现实一方面必然产生多元的文化权力诉求，另一方面也出现转型期的思想混乱和价值失范，因而极易产生社会冲突和危机。对此，只能疏导释放，不能强行压制。以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对待新的社会诉求，必然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汲取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文化

主义理念，尤其是其中的参与平等思想，将在价值理念的层面为中国补充重要的资源，有助于打造新的进步的价值基础，提升社会的思想凝聚力。

其三，从政治层面看，新社会运动发展了新的公民抗议形式，对战后西方体制形成了政治挑战和威胁，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参与民主制度的客观需要。

西方 1968 年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发展了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新社会运动对多元与差异的维护极大地改变了黑人和妇女等原先的非主流群体的社会地位；而 1968 年运动最大的教训，是在挑战政府权威和政治体制的同时，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断裂和政治动乱。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通过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民主，努力促进基层民主理念的制度化，才能积极地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乱。汲取新社会运动提出的协商民主、扩大公共领域和建立多元对话机制的主张，通过多样性公民民主的制度安排，排除体制障碍，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将是对 60 年代政治遗产的最好继承。

2008 年 5 月于北京—布拉格

注释

[1] 参见 Hank Johnston, Albert Melucci: New Social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

[2] 参见 Lawrence Wilde: Modern European Socialism,Dartmouth,1994。

[3] 参见 Lawrence Wilde: Modern European Socialism,Dartmouth,1994。

（周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文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原文链接：http://www.philosophy.org.cn/article_info.aspx?n=20091117153100217102）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陶郁：“愤青”究竟何许人也?

如今，在搜索栏中键入“愤青”二字，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网页会立刻呈现在你的面前，这还没有算上与“愤青”二字有关的其他衍生词条。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愤青”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了。有人因自己是“愤青”而感到自豪，并因此将“愤青”改作“奋青”；也有人将“愤青”头衔专门留给自己厌恶的对象，并将之贬低为“粪青”。

然而，在“愤青”一词被越来越多网民所使用的同时，却鲜有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被称为“愤青”的这个群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愤青”现象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情况。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上。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愤青”作为一个群体，其人员构成与行为话语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当下的媒体报道与学术研究，大多对此认识不足。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 CNN 运动”、“韩寒现象”和“69 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却发现：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

杨丽君和郑永年将第一个群体称为“民族主义型愤青”，这个群体是 2008 年反对 CNN 等西方媒体对华不实报道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或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青年。这类网民所愤怒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媒体及其他与国家事务有关的机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关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国内情况的关注。虽然这些网民常被指责与政府站得过近，但他们的愤怒往往出于自身，而他们过分高涨的民族主义热忱，也未必是政府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在外国媒体对中国“愤青”进行报道时，他们所说的“愤青”一般意指这类网民。

第二个群体被称为“批判中国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由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青年人构成，他们更关注国内情况，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并且对自己所不满的现象进行批判。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虽然这个群体所使用的刺耳词汇和语句，常会被作为管控的对象，但只要他们没有过激的举动，政府一般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干预。而韩寒是“批判中国型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但媒体对他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于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娱乐精神。

最后一个群体被称为“忿怒发泄型愤青”，包括网络黑客、游戏发烧友，以及其他许多处于高度社会压力下的人们。他们因为自身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而充满忿怒，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都可能成为触发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扳机。这个群体很容易发起或参与到突发性的网络集体行动中，他们的行动虽然在网上可能有很强的短期影响力和知名度，但一般并不会成为正规媒体的报导对象。

不过，杨丽君和郑永年也发现，虽然以上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之所以都会被置于“愤青”这个标签之下进行讨论，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共同特质。

首先，三个群体都善于使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精通互联网技术。第二，每个群体中几乎都同时包含生活在国内与海外的中国人。第三，每个群体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互联网，而互联网似乎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即便是“愤青”之间的线下活动，往往也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最后，每个“愤青”群体所关注的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往往都对国内的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愤青”呢？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这个现象反映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迅猛而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与许多人都密切相关的矛盾和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人们开始体验和对比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时，难免出现不安、不解和不快；而这些情绪在高度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发酵为不满和愤怒。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于是，许多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自己成为了“愤青”，也吸引或者刺激着许多类似的青年人加入这个群体。

不过，“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可能更像两枚透镜，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后者进行了夸张的折射。例如，杨丽君与郑永年也指出，由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力量，互联网上往往存在着比现实中更为多样和极端的声音；而“愤青”们之所以显得异常愤怒，也可能是他们的年纪使然——当如今的“愤青”进入中年壮年时，他们或许将和前辈一样，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激动。

同时，“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的复杂性也再次提醒我们，避免随意“贴标签”，是观察和分析中国互联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因为正如杨国斌教授此前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上的标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单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更加复杂却也更为重要的细节信息。

参考资料

Yang, Lijun and Yongnian Zheng. 2012. “Fen Qings (Angry You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76): 637-653.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启东市民集会反排污

江苏南通市欲建设一日本纸业的工厂，却将污水排水口设在**启东**，当地市民因此发出反对的声音，并通过网络手段号召市民 28 日发起游行，市政府也开始了无孔不入的维稳工作。但事件仍引起了网民们的注意，由于舆论的强大，27 日下午，启东市称已暂停该项目的工程建设，且再次要求市民不要上街。

新闻：http://fmn.cc/OhAl1M

http://imgur.com/o7xLJ

政府的声明并未阻止市民的抗议，7 月 28 日早上 6：30，江苏**启东**的市民就走出家门，到市政府门前进行集会，28 日上午的集会没有造成警民大规模的冲突，市政府大楼被市民占领，其中的文件被从楼上撒落。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被市民抓住，并要求他们穿上反排污的宣传 T 恤。28 中中午，启东派出所发公告称，这一项目被永久撤消，要求市民回家。

新闻：http://fmn.cc/MKYEFZ

http://fmn.cc/ML0ne8

面对市民的抗议，**南通市**政府和王子制纸也做出了回应，南通市有官员表示，政府进行大笔投资建造了这条排水管道，包括王子制纸在内的南通经济开发区多个化工厂的废水都将通过它排进启东市塘芦港外海，而不是传言的长江。王子制纸也称，自己的废水标准数据要低于中国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市民的抗议表示了担心。

新闻：http://fmn.cc/ML4bMw

王子制纸在南通的项目始于 2003 年，建设于 2007 年，并在 2011 年投产。**启东**市民得知废水将被排放到自家门口的海洋中时，开始了长期的请愿但都没有奏效。28 日上午的集会中，人们攻陷了启东市政府，并从中搜出不少东西，漫天飞洒的政府文件被抓拍下来。甚至市委书记和市长也被市民围住，上午现场虽有不少警察但并未发生激烈冲突，临近中午时分，政府宣布排污项目停工。不过官方没有表示如何处理后续问题。

新闻：http://fmn.cc/NNn6mX

28 日中午政府宣布停建排污管道后，数万市民逐渐从市政府门前散去。当日下午有大批军车载着警力抵达**启东**，网友和记者都称武警和警察对市政府门前进行了清场，期间警民发生了不少肢体冲突，情况被拍下视频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到了 29 日启东街头仍有巡逻的警察，但市民称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新闻：http://fmn.cc/T0BU3B

7 月 28 日江苏**启东**的反排污集会中，有数十家中外媒体记者到当地进行采访。不过朝日新闻的记者奥寺淳在拍摄警察殴打市民时，突然被夺走相机，并被 15-20 名警察推倒在地。虽声称自己是记者，但仍被踩踹了 20 秒左右，出示的记者证也被没收。事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南通市提出了抗议。

新闻：http://fmn.cc/Q2Rqw2

在 28 日的集会中，有网民发帖称有人被打死，而被警方控制，并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罚款 500 元的惩罚，在这之前，**启东**市公安局则在不断辟谣称没有人死亡。

新闻：http://fmn.cc/QHG2CB

针对这场风波，日本**王子制纸** 30 日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声明称，“已对污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称南通工厂将于 31 日恢复生产，“公司经营几乎没有受影

响”。

新闻：http://fmn.cc/T1tjhg

北京 7·21 暴雨

7 月 26 日晚八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给出 7·21 暴雨死亡人数的最新数据：截至 26 日，北京市共发现 77 具遇难者遗体，其中 66 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 名遇难者身份还在确认中。已确认身份的 66 人中，遇难人员 61 人（男 36 人，女 25 人），因公殉职 5 人。官方还公布了其中 61 名遇难者名单，其中最小遇难者仅 8 个月大。

新闻：http://fmn.cc/NnAJX8

不过由于 **7·21 暴雨**河北地区死难者不计入北京地区，当晚河北保定也公布了 7·21 暴雨中当地的遇难者，截至 26 日暴雨已导致 26 人死亡、20 人失踪。保定也公布了其中 25 名确认身份的死者名单。而河北省洪灾当时则已经导致 32 人死亡，20 人失踪。

新闻：http://fmn.cc/NnAZp4

http://fmn.cc/NMegG4

http://fmn.cc/NnB7Vw

上周**北京**、天津都遭遇了大暴雨，虽然泰达俱乐部以及京津两地球迷都有在赛中为两地暴雨灾害祈福默哀活动，两地球迷还曾计划在京津足球比赛中举办为死难者的祈福活动，但却被天津有关单位禁止。球迷都表示很无奈。

新闻：http://fmn.cc/OoZeoK

7·21 北京暴雨中，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村村民王建生在送完同学回家后不幸遇难，据家属表示，王建生遗体被打捞起后，120 急救车竟向家属索取 620 元的费用，引起人们的愤慨。随后红十字会回应称，费用已经退回。8 月 2 日赵白鸽回应此事时称，向遇难者家属收取

的 620 元运尸费经过物价局批准，并承认方式不妥。

新闻：http://fmn.cc/O4JTJF

http://fmn.cc/NnBEa3

http://fmn.cc/OGqenu

7 月 31 日**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全市 5 个暴雨受灾区县中，除石景山区之外，4 个受灾区县生活饮用水均受到了严重污染。市卫生局表示，受灾一周后，灾区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为此将针对疫情及时发布预警。

新闻：http://fmn.cc/Px39P5

伦敦奥运会

中国奥运选手周俊在举重比赛中三次试举均告失败，女举历史上罕见的零成绩引起人们关注，媒体发现，这个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地方利益问题和中国体育制度中的选拔问题，并不是年仅 17 岁的周俊所能承受的，她也只是一枚被牺牲的棋子。

新闻：http://fmn.cc/QxcQ6N

中国、韩国和印尼 4 组共 8 名选手因在 7 月 31 日举行的奥运羽毛球小组赛中利用赛制漏洞，为了避免同本国选手过早相遇而**消极比赛**。8 月 1 日被世界羽联正式指控，中国代表团也回应称，将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

新闻：http://fmn.cc/NnC54d

http://fmn.cc/NnCeo0

视频：http://fmn.cc/MdZHbt

北京时间 8 月 2 日晚，世界羽联决定，7 月 31 日**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比赛中被认定消极比赛的中国、韩国、印尼 8 名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她们被控“未尽全力争取胜利”。随

后韩国和印尼球员都提出了上诉，而中国则接受了处罚决定.

新闻：http://fmn.cc/MdZ4yKf

2 日晚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称，“于洋/王晓理赛场上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体育**公平竞争**的精神，中国代表团对此感到痛心，并坚决反对、严厉批评这种行为。”还称“中国奥委会历来反对任何人、任何队伍、任何形式的违反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做法。目前代表团正在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新闻：http://fmn.cc/NbPWvg

作为国羽主教练的**李永波**则称，自己作为主教练以及队员们“最主要一点对赛制理解还不太透彻”，并表示“不管是规则也好还是别的，这都不是理由。关键一点我们没有以一个职业体育运动员的身份，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没有践行奥林匹克那种全力以赴，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种精神。”李永波还向球迷和中国观众进行道歉。

新闻：http://fmn.cc/NbPVr2

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丁**面对媒体时表示，“相信看过那两场比赛的观众都会认同我们的处罚决定。我们很慎重，因为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取消比赛资格。许多年轻队员训练很多年，才得到这个机会。但考虑到她们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所以世界羽联纪律委员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他还表示“世界羽联将在奥运会结束后，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对奥运新赛制进行全面评估。”

新闻：http://fmn.cc/OGuPpz

香港游行反对国民教育

7 月 29 日下午，**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吸引了全港数万人参加，抗议者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而这手册里称赞中国模式，强调用人唯贤，并批评美国的政党政

治。包括“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等多个团体组成的“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动万人大游行反洗脑教育，并批评香港当局计划强行推动国民教育是无视民意。

新闻：http://fmn.cc/QxaAwz

港大 7 月末也发布此前进行的民调结果，数据显示**梁振英**评分回落，支持率下跌，反对者增加。而且调查显示，年纪越小的受访者，越倾向反对梁振英出任特首。民众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属负面。

新闻：http://fmn.cc/Qxb31J

梁振英也回应了市民的**“七二九游行”**，他称，国民教育非政治任务，“不会强推国民教育，亦不会硬性规定任何学校在今年 9 月全面开展，而是有三年开展期，学校可以自行决定今年、明年或后年推行。”但拒绝撤回课程。

新闻：http://fmn.cc/Qxbd9e

国民教育漫画：“不必认真小朋友”

链接：http://fmn.cc/QTPgMc

本周其它重点新闻

7 月 26 日，中国官方宣布，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与被告人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尼尔·伍德。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此案近日已由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将择日开庭审理。

新闻：http://fmn.cc/OoURdn

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被捕的韩国朝鲜人权运动家**金永焕** 7 月 25 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在中国被捕期间受到了各种刑罚，他的熟人说，中方人员拿电棒对他实施了电刑，且还遭到了各种残酷的拷打。

新闻：http://fmn.cc/O0awlC

中国宣布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收费公路**应当免费通行，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为行驶收费公路的 7 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新闻：http://fmn.cc/OGsGdB

据香港媒体报道，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亡事件一直以来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近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首次公开回应此事件。他称，自杀是证据充分、毫无疑问的，这是依照法律作出的结论。湖南省内没有人对这件事提出过任何质疑，包括李旺阳的家属——他的妹妹，也接受警方的调查结果。

新闻：http://fmn.cc/QxcvkJ

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健全红十字会经费审查监督制度。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察、审计。同时还称要切实加强对红十字事业的领导和支持，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

新闻：http://fmn.cc/OFPgRU

审计署今年一份报告中显示，**铁道部**曾花费 1850 万元请张艺谋拍摄一部宣传片，张艺谋称收取 250 万税后酬劳，媒体披露该片仅中介费就高达 700 万。有报道指纪委在对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调查过程中，在其家中发现巨额现金和房产证。陈宜涵和她的丈夫、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已经双双被立案调查。

新闻：http://fmn.cc/OFNSic



http://fmn.cc/Qxc0Ht

http://fmn.cc/OFKxzR

美国国务院在 7 月 30 号发布了《2011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中涉及中国的部分表示，2011 年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护显著恶化，中国还被列入“特别关注”名单。报告提到，中国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增加，导致 2011 年就至少发生了 12 起藏人自焚事件。中国则对这一报告表示了不满。

新闻：http://fmn.cc/MPpCvT

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和她丈夫董继勤 7 月 27 日二审在北京法院开庭宣判，二人的上诉被法院驳回，倪玉兰虽然被取消诈骗罪的指控但仍被重判两年六个月，美国国务院 7 月 27 日发表一份声明，表达了对倪玉兰夫妇和他们家人的关切。

新闻：http://fmn.cc/OwdfEF

近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对 5 起利用互联网、移动存储介质，进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案件依法进行审理。有 20 名维吾尔人被重判。

新闻：http://fmn.cc/Qxcai3

《人民日报》海外版 8 月 1 日刊登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旗号，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为核心，为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干扰中国崛起。

新闻：http://fmn.cc/R6rKQu

近日有记者在**石家庄**男科医院博大医院化验时，用绿茶替代了尿液，随后医生称尿液检测出了炎症、霉菌和杂菌，记者被诊断出重度肾虚、前列腺炎、附睾炎，并被要求花费高额费用

进行相关治疗。卫生部对此表示，这种做法是在误导公众，5 年前已有类似案例并被澄清。

新闻：http://fmn.cc/NbTHRl

【返回目录】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张博、童亚琦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田悠，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